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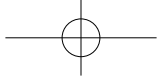
shanghai minjin

上海 民進

1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66 期)





上海 民进

目录

特别报道

- 4 中国民主促进会履行基本职能的历程 蔡达峰
- 8 强化数据赋能 推动工作创新 蔡达峰

政论

- 11 加快重启CCER交易市场 调动全社会力量减碳 黄震

大会建言

- 13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专题会议上民进会员建言精选 民进上海市委

建言献策

- 19 用客观评估助力“教育数字化”建设 戴立益
- 21 打破四困境, 促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张伟滨
- 23 建议提升商品房小区社区治理创新 陆勇峰

理论研究

- 25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关系转向” 周丽昀

耕耘随想

- 41 走进元宇宙的艺术 金江波
- 45 让每一个人遇见最好的自己 张园勤



M U L U

史卷拂尘

- | | | |
|----|---------------|-----|
| 47 | 揭秘鲁迅与鹿地亘最后的交往 | 沈琦华 |
| 51 | 忆表姨夫周建人 | 顾崇本 |

艺苑天地

- | | | |
|----|------------------------|-----|
| 53 | 宅门断想 | 陈鈺 |
| 55 | 赵丽宏: 诗心俱与人品长 | 汤朔梅 |
| 60 | 记民进优秀会员著名男高音独唱艺术家许幼黎同志 | 夏世铎 |

大事记

- | | | |
|----|-----------------------|--|
| 61 | 民进上海市委2023年1月至2023年2月 | |
|----|-----------------------|--|

1

2023年第1期（总第266期）

顾问

黄震 邓伟志 胡卫
赵丽宏 李名慈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蓓 何少华 康琳
蒋碧艳 蔡南南 曾如亭

主编

何少华

常务副主编

蒋碧艳

副主编

冯蓓

责任编辑

黄振兴

装帧设计

姜明 杨钟玮

地址：上海市陕西北路128号
电话：62672538（兼传真）62678028 × 1608
邮编：200041
E-mail: xcb@shmj.org.cn
印刷：上海梦鑫印务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上海民进会员
印刷数：5600



中国民主促进会 履行基本职能的历程

蔡达峰

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重要产物和鲜明标志，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其实践者和建设者，民进的履职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

一、民进先辈“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自觉，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

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忧国忧民，富有爱国、民主和斗争的精神，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发文章、办刊物、参加游行、组织聚会，在1945年共同发起成立了“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历史贡献。

民进成立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共合作陷入危机，内战一触即发。民进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下，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高举“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旗帜，发表宣言，针砭时弊，联系各界，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抗议“较场口事件”暴行、国民党当局屠杀进步青年、镇压学生运动、“劝工大楼血案”暴行、美军暴行、国民党签订卖国条约等；组织公祭和吊唁“一二一昆明惨案”遇难烈士、“四八”遇难烈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烈士等；声援上海大中学生爱



国民主运动、工人运动、中小学教师请愿活动以及全国反饥饿、反迫害、求生存斗争；揭露上海市参议会议员选举的伪民主真相、国民党当局内战阴谋、“戡平叛乱总动员令”阴谋、伪国大阴谋、“新的第三方面”实质；参与发起和筹建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及请愿活动，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

这些政治活动，不被国民党当局所容忍，民进先辈遭遇了南京“下关惨案”等严酷迫害和白色恐怖，被迫隐蔽分散，自然不在旧政权、旧制度的“职能”范畴内。这些政治活动，出于民进先辈“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自觉，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患难与共，当属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职能”。

二、新中国成立后，民进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关系，也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责任，为民主党派“职能”奠定了政治基础。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形成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筹备工作，民进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在筹备座谈会上提出并得到采纳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建议，当属于民进最早的几件政治协商性质的建议案。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郑振铎、葛志成、许广平、林汉达、雷洁琼参加了会议，马叙伦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小组组长，标志着民进正式担负起了政治协商性质的职能。同时，民进参与新中国解放事业，联合声明拥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上海各界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解放。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确立了民主党派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单位的地位。马叙伦在会上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同，这应该是民进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首个提议。同时，民进领导人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职务，出席国家最高国务会议，就重大外交事件发表意见，参加国家对外友好交流活动。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马叙伦委托许广平向会议提出了《请政府明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得到一致通过，并被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成为了新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建议案”。新政协赋予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职能。

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号召，民进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参与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事业发展，发动会员参加土改工作、抗美援朝工作、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响应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参、代、监、改”作用。同时，积极反映学生健康、代课教师、知识分子工作等情况。马叙伦反映的学生健康问题，得到毛泽东同志连续三次批示，是

民进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杰作。

三、在长期实践中，民进的履职活动已具备丰富的内容、规范的形式，在履职中体现使命和价值

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1989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十四号文件、两个五号文件，明确了民主党派“两项职能”，即：参政议政、民主监督。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职能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增加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以下简称“参加政治协商”），确立了民主党派“三项基本职能”（以下简称“三大职能”），为民主党派履职提供了政治保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实了重要内容。200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条例》，把“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作为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工作，规定了政协各参加单位的任务，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将这项长期从事的工作纳入了制度。

目前，民进会章对“三大职能”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都有明确规定，并依据会章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工作条例》《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工



作条例》《中国民主促进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条例》以及《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工作规则》《民进中央活动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民进中央提案形成办法》《民进中央政协大会发言产生办法》等配套规定，为履职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过长期的实践，民进目前的履职活动，已具有丰富的内容、规范的形式。在参政议政方面，一大批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司法职务；受中共中央委托，民进中央每年开展重点考察调研，就调研情况开展协商、报送建议；开展议政活动，定期举办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开明文化论坛、开明出版传媒论坛、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黄河保护与发展论坛、粤港澳生态环境高端论坛等，报送议政成果，形成了有影响力的活动品牌。在民主监督方面，受中共中央委托，民进中央先后开展了脱贫攻坚民主监督、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各地方组织受当地党委委托，开展了各种专题的民主监督活动；持续就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与检察院、法院保持联系，掌握监督需求；一批民进会员担任各级特约监督员、监察员、检察员、党风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土地监察专员、物件监督员等，监督政风行风。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方面，民进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协商会议，包括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其他专题协商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等；组织开展书面协商，随时报送意见建

议；参加政协大会、常委会会议以及各类议政性的专题协商会，参加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等工作会议，参与承办各类协商座谈会；提交党派提案、界别提案和委员提案；报送大会等各类会议上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在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面，组织会员报送信息；收集办理并向政协和党委统战部门反映。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首次将“履职能力建设”作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任务，对履职能力提出了建言资政和凝心聚力双向发力的要求，民进积极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围绕把握大局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集智聚力的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聚焦“三大职能”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相继开展了主题年建设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履职体现使命和价值。77年来，民进不忘合作初心，在多党合作事业中积极作为、发挥作用，谱写了光辉的履职篇章。奋进新征程，民进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和引导广大成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挥特色和优势、创新思路和举措，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强化数据赋能 推动工作创新

蔡达峰

在信息化建设主题年中，民进坚持把学习放在突出位置，深入领会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学习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把民进开展信息化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作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增强了信息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民进努力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化发展趋势和特点，面向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各方面，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打造了电子公文系统、组织会员信息基础库等应用平台，完成视频会议系统建设项目，推进信息化工作平台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工作流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形成了全会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为建设数字民进、智慧民进打下了坚实基础。民进坚持问题导向，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差距，应用水平、建设能力、体制机制等方面都有待提升，建设任务依然繁重和紧迫，必须持续发力，总结经验，深化主题年建设成果，实现信息化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就此，我简要讲三点建议：

一、坚持大力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民进全面提升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能力的需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有关意见、《中国民主促进会



章程》、民进“十三大”报告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担起责任，积极作为。

(一) 要坚持统筹推进。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全局。牢固树立全局观念，下好“一盘棋”，走一体化建设之路，实现民进全会信息纵向打通、横向协同，集成共享，确保统一性和完整性，避免出现信息孤岛、使用壁垒、重复建设等现象。要坚持以规划为纲，民进中央要持续抓好五年规划实施，聚焦目标任务，加强统筹协调，注重整体推进，把握共性，明确重点，明确步骤，明确地方组织的任务；各级组织要以规划为依据，充分用好全会资源，密切配合规划进度，积极推进自身建设。民进中央与地方组织机关部门要经常沟通，加强联动，保证

建设步调一致，形成整体效能。

(二) 要加强组织领导。信息化建设需要高效、顺畅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主题年期间，各地方组织成立了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工作专班，一些地方组织还邀请会内外专家，成立了专家组，形成了党派工作和专业工作相结合的建设工作领导力量，起到了良好效果。各级领导班子要保持优势，加强牵头抓总、组织推进的作用，强化长效机制，坚持把信息化工作纳入重点工作计划和重要议事日程，抓好工作落实。

(三) 要发挥人才作用。充分激发机关干部积极性，发挥会员中专家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和活动，提升自身信息化建设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在实践中打造一支懂党派



业务、懂网络技术、富有创新意识的建设队伍，为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人才支撑。

二、强化数据赋能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法。民进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和好同事，必须跟上信息化发展进程，增强数据意识，夯实智慧民进的基础，加强数据利用，开发数据潜力，推进管理和服务创新，促进民进工作的科学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一）要注重数据预判。及时掌握关乎中心任务和发展大局的数据，利用数据分析预判，引导和组织会员建言献策，发挥作用，提升履职水平；及时掌握会内现状和发展动态，科学规划组织发展，开展会员工作，提高自身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强化自身建设。

（二）要用好数据资源。我们取得了大量履职成果，它们是丰富而专门的数据资源，包括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民主监督、重点考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议政建言、定点帮扶和海外联谊等，还有很多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事业的数据，在信息化建设中，要提高梳理分析的能力，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要充分整合数据。加快建立健全民进数据资源目录和数据资源标准体系，规范数据采集、共享和使用，破除“数据孤岛”，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

实现从数据层到信息层到知识层的提升，促进会内数据的有序开发、规范流转和安全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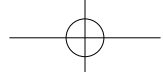
三、推动工作创新

信息化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我们要把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业务，融入现有的业务工作要求中，创新工作方法，推进业务能力提升。

（一）要强化示范引领。以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为重点，提高信息化建设的谋划能力和应用能力，促进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双向发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结合主题年开展的公文流转、基础库、视频会议系统等建设项目，以点带面，促进信息化建设工作成果在全会的转化和推广。

（二）要推动创新实践。以应用为导向，积极推进移动办公、智能履职和大数据应用的尝试和实践，持续推动理念更新、技术革新和工作创新。

（三）要做好用户体验。信息化建设要贴近工作、贴近用户，让大家充分体会到便捷性、易用性和高效性，充分享受获得感，从而为信息化建设提供更为广泛而强大的动力。在新一届民进中央的领导下，民进全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民进十三大精神，增强紧迫感，持续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民进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的水平，在服务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政

论

加快重启CCER交易市场 调动全社会力量减碳

黄震

编者按：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加快重启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市场。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特定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CCER交易市场作为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配额市场之外引入的自愿减排市场交易，用于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是对强制性碳交易市场的有益补充，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经济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确定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一系列工作流程。

2015年，国家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正式上线，CCER交易正式开启。“运行两年后，由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2017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黄震说。

2018年5月，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恢复上线运行，存量



CCER交易市场重启,但增量项目备案申请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我国现有的CCER交易还存在项目开发周期长、方法学不完善、减排量核算困难等问题。”黄震说。

2021年,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中国碳交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双碳”目标下,越来越多控排企业而非控排企业都有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愿望和需求,CCER交易需求不断增长。加快重启CCER交易市场,对我国碳市场建设意义重大。对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重启CCER交易市场,尽快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确立CCER交易市场的交易登记和交易规则等基本制度和参与各方权责。加速推动自愿减排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的建设,重启CCER项目的审批,

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备案事项,缩短项目开发周期。

二.加快构建符合当今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CCER方法学体系,完善减排量核算方法。利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遥感卫星等新技术,不断完善CCER减排量的统计和监测方法。规范CCER项目的审定和减排量的核证,确保数据质量与CCER质量。

三.建立统一的CCER交易市场,统一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加强对参与企业、审定与核查机构及交易机构的管理,建立各参与主体的碳交易信用综合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引入行业自律机制,加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构建合规的CCER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加强CCER与其他减排工具如绿电交易或绿证等的协同机制,避免减排项目的重复计算。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专题 会议上民进会员建言精选

发挥新阶层力量, 加强对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卢慧文

上海市政协委员

协和教育中心总校长



2018年夏, 我随中央统战部首次组织的新阶层代表人士考察团前往香港和澳门进行考察。代表团在和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行业人员进行同行交流的时候, 香港的接待方感慨, 这些年来内地过来的考察团, 主要是工商界代表团和政府代表团, 而体制外的专业人士代表团见得非常少。专业人员之间的同行对话, 话题特别多, 共鸣特别强, 当天会议原定的几个发言结束后, 大家又自发进行分小组讨论, 意犹未尽。

犹未尽。

2022年秋, 我受邀参加由上海市政协和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共同举办的在沪外籍人士“走进政协”活动, 多位本职工作为国际教育、法律咨询、文化艺术的政协委员用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自己参政议政、双岗建功的履职



工作,引发高度兴趣,双方开展了深入的对话。后来上海电视台英文频道还专门邀请我和一位匈牙利朋友制作了一期访谈节目,聊这次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也收到了很不错的成效。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外企和民企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互联网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他们专业化程度高、中外话语系统通畅、跨文化经验丰富、对外交流的意愿强。新阶层人士通常有两个很明显的标签,一个是国际化,大部分人有过海外经历,另外一个互联网化。在一个多元的环境里,能够用对方听得懂、愿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有机会讲好接地气的、真诚的上海故事,展示可亲可信的中国形象。建议要发挥新阶层的力量,使其承担起对外交流的功能。具体建议如下:

一、以各种方式支持民间智库、行业协会、行业研究院开展国际交流。

建议上海要支持各行业的民间组织通过信息交流、友好互访、项目合作、联合研究等方式,尤其是参与或者承办有行业影响力的国际化研讨会、论坛等,与国际同行进行公开交流并邀请其实地参观走访。一次亲身体验胜过百次远程交锋。通过专业的、和平理性的对话交流和真实友好的现实接触,交流各方可秉持求同存异基本原则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并适时开展合作互助。以我自己从事的民办国际化教育领域为例。无论文化背景多么不同,教育体系多么不同。世界各地的教育所面临的当下挑战、正在做的专业工作有

很多共通的地方,话语系统相对更为接近,可以开展合作的机会多、效率高。因为是民间的专业层面的交流,大家顾虑比较少,讲话比较朴实,信任感比较强。我们应当多鼓励校长和老师在国际教育组织中担任项目协调员、在国际教育论坛中担任主旨演讲嘉宾、鼓励中国学校承办教师专业发展论坛和工作坊。上海的民办中小学,很多是双语的国际化学校,办学水平在国际同行中有很好的口碑,应当发挥好他们的力量,吸引国外同行前来交流,讲好上海教育的故事,展示中国教育者的风采。

二、以各种方式帮助旅游业复苏,支持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走出去、请进来,重启高水平的国际交流。

建议上海尽快重启高水平的文化展演、体育赛事,让上海的剧院和场馆重现国际交流的盛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了一批国际民间节庆活动,如街头体育艺术节、街舞艺术节等,应当鼓励上海的独立艺术家走出去表演和交流,展现中华文化的精彩,还可以通过联合同为新阶层力量的专业艺术制作公司,以及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机构,协助其进行文化创意项目的投资、合作和版权交易。文化艺术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聚的领域,通过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开展民间外交,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塑造一个真实可亲又可信可敬、并得到世界更多人民认可和支持的“中国形象”。

总之,摁了三年的暂停键要重启,不是政府



一家的责任，民间力量应当发挥、新阶层的活力需要被激发，全方位立体发力，使得我们熟悉的、为之骄傲的上海尽快回到世界大家庭。

绿色低碳冶金，助力美丽上海

严鸽群

上海市政协委员

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需要全社会各行业的共同努力，钢铁行业是碳排放大户，2021年，中国钢铁碳排放18亿吨，占中国15%，如何做好钢铁行业的双碳工作，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

钢铁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绿色低碳冶金，而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推动加大废钢使用。废钢是可循环利用的绿色再生资源，每使用一吨废钢替代铁矿石，可以减少1.6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随着钢铁行业供给改革的推进，但是市场集中度低、交易不规范、税收政策不完善等等因素，依然制约了废钢行业的健康发展。2021年，中国的废钢比21%，远低于全球的37%以及发达国家60%的水平。2022年，中国废钢回收加工量同比下降了20%，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60%，废钢产出低于预期，税务风险影响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废钢行业前端多为个体经营户，不开票的现象严重，侵害国家的税基，正规企



业有的减少采购，有的依然用资质凭证做成本列支，造成票户分离的乱象。

上海市废钢资源比较丰富，2021年废钢产出大概900万吨，共有大小废钢加工回收基地1000家，但是工信部准入基地上海只有6家。2022年，国家推出了《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在2025年全国将建设1000个绿色分拣中心，全国60个大中城市将率先建成废旧物资的循环利用体系。上海市积极响应，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引导建立大型化、规范化、绿色化的分拣中心。由于各项工作刚刚起步，产能利用率低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推进上海产业规范发展，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有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上海市废钢循环体系建设，引导废钢分拣中心大型化、绿色化的同时，培育龙头企业，协调支持加工企业与产废企业与钢厂用户对接，促进废钢从回收、分拣、加工、综合利用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

第二，创新推进上海平台+实体的废钢产业发展模式，率先打造互联网+回收的解决方案，联合龙头企业开展交易、服务、监管三位一体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配套产业扶持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行业痛点，依托平台的区块链技术与国



家税务系统对接,创新平台,开出增值税电子发票,进一步打通与地方大数据平台互联互通,通过以票管税向数据控税的转变,打造上海互联网+大数据的监管新模式,通过以上措施促进上海响应国家率先打造为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返城市,支撑双碳目标实现,助力美丽上海的建设。



物质材料和工艺技艺所创造和美化的人工造物,如“松江的顾绣”、“嘉定的竹刻”、“上海绒绣”等。上述三项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

激发创造力, 传承“最上海、最江南”的工艺美术

蒋国兴

上海市政协委员

上海供春陶业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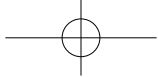
艺是当时由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代表市人民政府论定的“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2006年“顾绣”“竹刻”被列入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顾绣”、“竹刻”成为上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设计之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工艺美术是与中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特殊行业,其作品和产品包含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思考行业的未来,传承“最上海、最江南”的工艺美术,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定位要求,聚焦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坚持守正创新基础上激发行业的创造力,服务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众所周知,上海的工艺美术是我国工艺美术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着“最上海”的城市文脉:我们有青浦“松泽文化”遗址的陶器;有“最江南”的乡村文化机理:有千年古镇朱家角“课植园的读书不忘耕植”的“家训”等等。上海这座城市的先辈们为我们留下来的工艺美术品,包含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

工艺美术品是人民群众为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

2010年上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设计之都”,上海加入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十多年来,“设计之都”的活动促进了上海设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遍布上海16个区的园区,现在文创园区已经成为年



青一代奋斗生活的舞台或载体,也是年轻一代休闲娱乐社交的公共空间,如本市黄浦区的“8号桥、静安区的“800秀”等等。我们要通过“设计之都”专业活动的示范、引导、国际交流和国内合作等等创意创新的活动,吸引本市各行政区的区域产业与之融合:有步骤形成跨界融合、产城融合、产城一体化的崭新局面;建议通过国家、市区两级人民政府的产业引导,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尤其是工美行业“文创小微企业”的活力,全面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的由本市六个委、局联合发布的《上海市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的要求,发展好时尚工艺美术品、美学生活用品;我们要发挥工艺美术品包含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独特优势,聚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色资源”,用好中共“一大会址”“二大、四大”的标志物,引导红色旅游工美文化创意纪念品的创作,鼓励和引导本市的行业从业者潜心创作工艺美术精品力作,为追寻“最上海”、“最江南”的足迹、讴歌时代的英雄、讴歌人民群众的先进形象。我们本市和在上海工作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要通过优秀的作品、通过精品力作,吸引行业同仁集聚上海创作、创意、设计和整合梳理好信息资源,依托专家智库团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身体力行繁荣发展工艺美术,致力于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的优秀工艺美术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上海市现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0 多人,我

们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切实发挥好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专业团队的示范、引领和导向作用,为我们这个时代、为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塑像。通过优秀工艺美术作品的呈现,讲好中国故事,助推文化自信自强,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服务;我们要在行业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丰富多彩的工美文化创意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内容,丰富上海的城市品格和彰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更好地满足市民对健康、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建议在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加强与辖区新社会组织、新社会阶层、企业和工美大师工作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共建的平台、共享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切实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服务;为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作出新的贡献!

优化城市治理模式,打造 精细宜居城市

蔡永洁

上海市政协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上海的城市建设完成了快速、大规模和粗放型的城市化历程,进入精细化的建设时期,城市更新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的主题。近年来,城市建设实践与过去的建设模式展现出差异,表现出更加整体、更加复合、更加



人性化的空间尺度、更便捷的生活这些特点。比如虹桥商务区等项目，总体来看，这些项目对于以往尺度宏大的建设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与宜居城市的理想尚

存在一定的距离。杨浦区大学路的成功经验非常遗憾没有得到推广。

精细宜居城市，顾名思义，从文字解读可以直观发现，精细宜居的建设首先要做到细，改变迄今为止的大项目主导开发模式，化大为小，将大项目切分为小项目，在城市建设的总体控制下由不同主体进行建设，产生多样性和丰富性。必须说明小项目主导城市建设会带来速度和效率的下降，但如果真要追求精细，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其次，宜居必须体现出人性化的空间尺度和便捷生活，要求小尺度的建筑、街道、广场，立体化的高度功能混合是便捷的关键，混合不仅体现在地块内部还要反映在地块内部，这是形成城市多样性最有效的手段，对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意义重大。

2019年，上海市政协提出长期规划模式、创新产业准入机制、创新存量更新机制等土地高质量利用等六个创新建设，为宜居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结合国内国际成功经验，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缩小建设项目的规模。过去的建设主要以整合土地和大规模项目为出发点，这种模式保证了建设的高效率，但是造成城市空间单一，可以将大项目进行切分，为精细化城市打下基础，小规模项目的引入可以吸引小的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有利于扶持小微民营企业为城市经济增添活力。

第二，创新土地多样使用模式。传统单一的土地开发导致地块功能单一，削弱生活便捷性，因此必须打破单一土地性质管理模式，鼓励地块内部以及建筑内部的混合功能建设模式，对相关城市建设规范进行适当修正，以保证功能混合的落实。目前控规的管理模式应该到了改进的时候，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应该有勇气进行探索。

第三，探索产业与机制的混合。今年产业形态与传统生产大相径庭，以创新创业产业为代表主导着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发动机，新兴行业的小规模以及生态友好性特点，保证他们融入城市，在土地综合利用方面，应积极探索小微产业与居住空间的混合模式，推动产城融合的模式。我们讲混合，最关键是要尝试做到居住和生活的混合，不光在地块内，还要在建筑内。



用客观评估 助力“教育数字化”建设

戴立益

教育部明确了“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方针，并建成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如果说“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教育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则可被称为教育治理数据化的新基建。建议可借鉴相关试点经验，适时建立中国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体系，以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准确性、完备性、时效性的数据建设支撑“数字化”建设。

“数据打架”等现象成建设瓶颈

由于数据采集主体条块不清、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等问题导致“数据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数据是数字化建设的底座，建立统一的、科学的、动态的数据系统是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必然。我国目前有“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区域性监测评估数据、学术研究调查数据、各省级教育评估数据、学术项目调查数据等。这些数据的采集主体、采集方式、服务目的各不相同，导致“数据打架”现象时有发生，成为数字化建设瓶颈。

多源数据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给数据的分析、甄别、集成带来困境。目前我国的教育类数据存在统计和调查口径的较大差异，有的以时间为单位，有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有的以学校为单位，有的以学段为单位，有的以调查人群为单位，这给数据后期处理、分析带来难题。



既有数据监测评估体系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目前的区域、省级的分类教育数据监测较多，无法有效反映全国整体概貌。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监测评估水平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西部有些地区还根本没有实施相关工作。这导致政策供给的普适性不足，以及无法有效评估区域差异等问题。

既有数据指标体系大多聚焦教育发展现状，对评估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不足。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以新的内涵特征、历史使命与发展路径，应在新发展理念等的指导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

平台数据建设支撑“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建议适时开展“中国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工作，建设“国家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平

台”，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配套，通过统一的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准确性、完备性、时效性的数据建设支撑“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具体实施。

建立全国及教育现代化监测长效机制，建立多源、动态的数据采集体系。结合教育部正在推进的教育事业统计改革实践，建立统一、科学、动态的教育数据监测评估体系和监测评估平台。以数据支撑数字化建设，为数字化提供科学有效的资源底座。成立专职研究机构，统一管理和分析全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数据。

建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评估指标体系，创新教育现代化数据监测机制，提供一种不同于全球教育监测、PISA、TIMSS的制度创新，建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既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打破四困境， 促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张伟滨

“缺依据”“不敢转”“不会转”“路不通”，这是对于当前医学医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普遍存在四个现实困境的总结，亟待制定针对性改进策略。

成果转化面临政策冲突

“缺依据”主要表现为公立医院在转化关键环节无据可依。这是由于公立医院无形资产管理涉及后勤、信息、财务、资产管理以及科教等多个部门，难以综合定价，导致公立医院在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缺少依据，难以适用。

同时，科创人员因为担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敢转”。即使科创部门出台了支持成果转化新政，但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仍按旧标准执行，科创人员和管理者担心成果转化触发财务风险。现实中，由于生物医药行业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权威定价体系未形成，因此，大量前景不明的医学成果，估值时不确定性大，一旦后期实际市值高，极可能在事后审计中，被认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医院和医学院普遍缺乏专职辅助转化团队，使得高水平公立医院医生有了好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转”。

此外，2012年人社部和监察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从事、参与经营类活动或兼任职务领取报酬。各地公立医院也多有“不允许医院以代持方式成为股东”的规定。一旦医院作价入股，医生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产品进入医院使用，会带来既做



“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风险。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的作价入股投资“路不通”，而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又往往不适合高水平医学成果转化。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百米

建议要统筹多部门制定政策，厘清政策模糊地带，共同商定免责条款，共同划定转化过程中的“红线”。可借鉴华西等医院转化经验，明确转化规章，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百米。

高校应成为专职辅助转化人才集聚的场所。

“依托高校”组建专职辅助转化团队，可更好沟通上下游、辐射学校/附属医院及科研院所。

斯坦福的OTL模式已成为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标准模式，主动出击寻找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并设立技术经理人对每项成果全权负责沟通、专利、谈判及收益分配等，增强成果转化效率。这一模式值得国内医学院和医院借鉴。

政府还需加大力度畅通相关渠道，清除影响作价投资方式落地的规则阻碍，畅通“产学研”创新链条，推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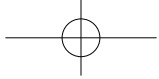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建议提升商品房 小区社区治理创新

陆勇峰

近年来,本市开展了围绕以老旧小区为主要对象的“美丽家园”建设工程,在改善社区居住环境,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方面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大量建于2000年之后的商品房小区,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公共活动空间缺失、绿化环境品质下降等问题,尤其是停车问题更是诸多小区普遍面临的痛点,夜间车辆占道停放导致消防通道、救护通道等生命通道堵塞,成为了重大安全隐患。此类商品房小区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很高。

1. 居住环境品质下降,停车矛盾尤为突出。建于本世纪初的商品房小区,房龄也近20年,大部分此类小区建筑外观整体尚可,但小区内部因年久失修、维修基金使用、物业管理等诸多因素,小区环境与建成之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品质下降。如路面等基础设施老化、部分公共设施长期缺少维修、老人儿童缺少休憩活动空间、绿化环境小品设施破损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此类小区建设之初的停车配比不足,随着机动车的数量激增,小区停车难成为了最为突出的矛盾,停车空间挤占道路、活动场地、绿化等成为了常态,也成为了社区潜在的安全隐患。

2. 居民反馈机制不畅,缺少议事协商平台。疫情一方面对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小区层面的各种业主微信群,除了关注防疫等相关信息,居民逐渐开始线上讨论社区问题,比如停车问题(包含“僵尸车”处理)、公共设施、宠物、流浪猫等问题,也包括对居委、业委、物业问题的讨论。微信群激发了中青年群体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热情,但由于缺少线下的议事协商平台或协商机制不完善,导致居民和居



委、业委等之间存在对接困难、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居民较少有深度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和载体。

3.社区治理三驾马车,物业监管存在缺失。按照现行社会治理体系,对城市居民社区的管理一般都会有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三个机构,并且都有各自的法律地位。但由于各自作用、诉求和利益的不同,“三驾马车”往往南辕北辙、推诿扯皮、纷争不断,受影响、受伤害的却永远是他们赖以生存、管理和服务的社区居民。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有矛盾成为了常态,冲突也司空见惯,居委、业委缺少对物业强有力的监管和指导,导致了业主“花钱请大爷”“掏钱买气受”的窘境。

对此,建议:

1.强化系统思维和规划考量

住宅小区有机更新作为系统工程,一是因地制宜与居民现实需求对接,及时回应居民反映的社区建设问题,做到“有人情味的更新”;二是与长远发展相衔接,前瞻规划小区未来可预期的各类施工及综合修缮项目,加强统筹推进和有序安排,避免反复扰民和重复建设,做到“可持续的更新”;三是与社区人文精神相融合,综合考虑建筑环境、社区文化、人口结构、邻里交往等多方面因素,既能立足于小区自身特点,又能体现时代风格,做到“有文化底蕴的更新”。

2.更新完善标准体系建设

建议借鉴既有的老旧小区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建立健全商品房住宅小区有机更新标准体系,明确规范程序、推进及操作流程,形成系列

操作性文件。一是推行项目化管理。要重视源头把关和过程风险防范,抓好商品房小区有机更新的环节控制和细节监控,确保环环紧扣,形成项目有机闭环。二是用社区分析工具精准发现社区需求,形成“小区特征”“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根据居民诉求和现实需要,梳理确认好住宅小区更新项目清单,明确工作要点和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形成本辖区项目库。从项目调研、立项、施工、竣工、验收、管理、再更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视角,来推进实施项目,真正做到当下为民、长远为民。

3.深化多元参与

一是强化“三驾马车”的组织引导作用,通过聚合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各方资源,厘清治理“元素”,深化党建引领“核心地位”,夯实居民区党组织,强化居委会对业委会、物业公司指导和监督的“主导地位”,发挥业委会、社区团队、居民代表和志愿者等“参与主体”力量,引入社区规划、法律援助、文化建设、物业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支撑”力量,不断深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群众自治,为居民群众提供精细化服务,组织居民群众依法有序全程参与到住宅小区有机更新项目的推进中。二是加强资金筹措。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如在居民区层面探索实施社区自治金项目、社区营造项目,在街镇层面探索建立社区专项发展基金和社区共治金,并达成契约、规范使用,同时完善住宅小区有机更新项目的盈利模式,利用小区共有资源,如招商、广告、服务等,拓宽其他资金来源渠道。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 “关系转向”

周丽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与应用影响深远,给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人工智能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对我们理解很多问题也有前提性的形而上的意义。人工智能哲学和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不仅提出了诸如自主性、意向性、机器伦理等关键概念,也探索出了不少人工智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类似研究多少存在一些尴尬之处:一方面,人文学者总觉得一直在一些问题上打转,如隔靴搔痒,不甚满意;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又觉得人文学者的研究固然有意义,但是实践性和指导性不强,并不买账。因此,似乎需要回到问题的根本,用哲学的方式来看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人工智能哲学应该是对人工智能思想的思想,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目标似乎不应是解决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伦理问题,而是改变和创新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并不是否认以往研究成果的价值,而是立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本身进行哲学式的前提反思和理论批判。

在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之前,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进行回溯是必要的。当前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共识和困难,又该如何展开?在此基础上,不难发现,人工智能伦理中的“关系转向”是一种可能的竞争性策略,重要的不是通过控制和约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制定统一的伦理规则,而是重新认识到,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是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共同创造。我们需要反转我们的认识和理



解,把人工智能当成伙伴,在关系思维中谋划更好的人类未来。

一、当前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主要议题

人工智能伦理是科技伦理的一部分。从狭义层面来说,人工智能伦理指的是人工智能自身的伦理问题,包括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从广义的层面来说,指的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引发的一些伦理问题(如人工智能对自动驾驶、就业和教育的影响)等等。当前,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学界,都提出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说法。厘清相关讨论的路径、焦点和挑战,才能为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扫清障碍。基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我们不妨借助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理论框架,来廓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主要面貌。

1. 本体论层面:人与机器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工智能时代是物质工具、能量工具与信息工具高效整合的时代。1956年,在达特茅斯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第一次创造了“人工智能”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和工程”。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和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进一步提出,“定义人工智能有四种方式:(a)像人一样行动;(b)像人一样思考;(c)理性地思考;(d)理性地行动。”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广义地理解,人

工智能是让机器做一些需要认知功能的事情,比如思考、学习和解决问题,而这些通常是在像人类这样的智能生物身上完成的”。与之相关,人工智能采取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符号人工智能,即试图通过符号推理和逻辑来表现认知功能,这一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导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概经过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机器模拟人类智力的水平来提高生产力;第二阶段是实现机器的全智能化,并逐步替代人类的参与;第三阶段是智能机器可以创造机器,虚拟分身大量普及,使每一个人具有增强智能(intelligence automated,IA),“‘增强智能’是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结合”。这可能会产生超级智能,重构人与机器共存和协同的社会秩序。

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人是什么、机器是什么必然会成为绕不开的追问。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什么?人的自我和身份认同是什么?机器是否具有意识和自主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可以构建真正的人工智能。

对人的理解主要有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两种:本质主义以二元论为基础,是西方思想史的底色。以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近代哲学,尤其是笛卡尔哲学为代表,卢梭、马克思以及萨特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种本质主义思路。这种思路保证了人在理解变动不居的世界时对自身完整性、独立性以及精神价值的确证,是近代科学得以成型的思想基础,往往具有很强的目的论



特性。但非本质主义也一直在本质主义周边如影随形，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到谢林和黑格尔的大全思想，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到梅洛-庞蒂的知觉场——总有哲人试图弥合二元论带来的身心分离，消解本质主义带来的思想禁锢。可以说，对人的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理解构成了一项跨越数千年的辩证运动，并最终在21世纪通过科学技术这种现实形式显现出来。人有无永恒的本质以及技术对人之为而言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揭示出来。海德格尔、斯蒂格勒以及唐娜·哈拉维正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

人与技术的相互依存由来已久，但是在人工智能以及基因工程技术飞速发展之前，人和机器的区分并不是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内化到人的身体中，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和机器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那么，是什么使得“我”跟其他人或者物区分开？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关于这个问题，著名的“忒修斯之船”给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博物馆里有一艘船，有些部分开始腐烂，坏掉的部分被逐一替换，直到所有的部分都被替换掉，那么，这还是同一艘船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认为被替换的船不是原来的船了？另外，假如将被换掉的部分重新拼成一艘船，那我们该认为哪一艘才是原来的船？“忒修斯之船”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或者同一性问题进行了质疑。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还不足以完全替代人，但是，机器接管到什么程度，机器就不是机器，人就不是

人了呢？如何区分哪是人工智能（AI），哪是我（I）？

另外，如果人通过智能机器来控制机器，又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与之相似的帕菲特思想实验：假定将来会有一个传送机，这个远程运输装置就会在你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对你的细胞进行拆解并扫描，并把相关数据传送到火星，在那里用相关设备接收数据，再组建成一样的人，那么火星上的人会是另一个自己吗？“帕菲特让我们想象两种不同类型的传送机。一种在扫描他的同时摧毁他，另一种则不摧毁他。它们都利用扫描到的信息创造出了他的复制品。”这种“二重身”似乎只是想象，但是放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上，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假如我们是机器，我们能造一台同样的机器吗？如果我们真的造出来，它会有自己的思维和意志吗？两者具有人格同一性吗？未来的智能机器只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是在体验这个世界？它是否既具有自知又能够反思这种自知？假如机器有意识，那么机器除了需要问“我是谁”，可能还需要问“我做对了吗？”

在人机关系与身份认同方面，如果我们想去追究人之所以是人和机器之所以是机器，应该怎么去理解呢？研究者经常拿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作比较，认为人工智能来自于机器对思维的模拟，而人类智能却大不相同。从本体论上看，人是碳基的，机器是硅基的；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我们可以体验这个世界，而机器却只能测量它。而人之所以能体验，是因为人有身体，可



以感知意义。即便是持身心二元论的学者可能也无法否认身体对思维的承载作用，抛开身体谈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区别，会流于简单和草率。毕竟，人的思维是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被牢牢固定在身体内，而机器智能却可以完全脱离身体存在，并且还可以同时在多个地点进行复制。

除了身体，环境也成为延展认知和思维的一部分，这些环境是由人、机器以及一些伦理规则和制度等共同构成的。1991年，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在《人类共性》一书中指出：“人类的共性包括文化、社会、语言、行为和心灵的特征，没有已知的例外。”基于关系主义的视角，似乎可以理解，机器人的意义不在于机器人本身的表现，也不在于人类的想象，而在于具体的人机关系及其运行环境。“环境的结构化程度越高，制造在其中运行的机器就越容易。”往往使许多机器的应用得以实现的不是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结构化程度更高的环境，真正能够完成一些机器智能的目标是人和结构化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

2. 认识论层面：人的机器化与机器的人化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今时代，人与机器的联结越来越紧密，以至出现了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人化。人的机器化是指人的认识诉诸理性、逻辑性以及确定性追求，通过计算和逻辑，使人类达到机器思维的准确性和可控性。随着身体的技术化，技术可以对

人的身体进行替代、延伸甚至是重组，我们的身体不只是自然生产的，还可能是技术制造出来的，人有机器化的趋势，这对传统的人的本质理解构成挑战。机器的人化是指机器智能越来越多地在认知、记忆等层面突飞猛进，机器越来越具有一些类人的属性，尤其是机器思维与机器模拟的发展，使得人对机器智能可能达到的程度充满想象空间。人工智能将来是否会具有意识，是否会具有类人或者超人思维？这对我们传统的关于意识的理解，甚至对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范畴的理解，都会带来冲击。

意识和自主性是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钥匙。那么，意识究竟是什么？英国心理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在《国际心理学大词典》当中写道：“意识是一种有趣而又难以琢磨的现象，你无法确定它是什么，它如何运作，或者它为什么会产生。”[4]意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讨论意识这一问题时，即使是最严谨的思想家也可能会语无伦次。提到机器的思维和意识，不能不提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设计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大意是假设某个大脑浸泡在营养液中，并通过导线与躯干相连，大脑的意识对躯体动作发出的指令，并通过导线双向传递，这时你会认为这还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脑吗？库兹韦尔在他的《如何创造思维》一书当中明确提出了机器意识的问题，他认为意识是复杂物理系统的有限特性，可以在计算机中复制，一台成功模拟人脑复杂性的计算机也将拥有与人类相



同的涌现意识。并且,他通过“弱涌现”和“强涌现”来解释机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库兹韦尔认为,当机器说出其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信其所说的是真的,机器就成为有意识的人了。库兹韦尔将意识理解为“思考自己的思想的能力”,我们能够通过测试来评估这种能力,然后利用测试区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物,但是库兹韦尔也指出:“在讨论意识时,人们很容易陷入对意识的可观察性和可衡量性这一问题的思考中,而这种方法忽略了意识的本质。”

许多观察者认为,意识是一种表现形式,是能够理解自己的思想并对其进行解释的能力,例如自我反省的能力。梅洛-庞蒂认为,意识是主观体验,是第一人称的知觉,没有体验就不会有意识,感知能力是意识的先决条件。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曾对图灵测试的意义质疑。他说:“身体因素是我质疑图灵测试意义的原因所在。”他设计了一个测试(他称为“斯加鲁菲测试”,Scaruffi Test),是同时给机器人和人各一个足球,然后看哪一组运球的能力更高,他指出,虽然智能机器人可以灵巧地拦截足球,然后用绝对精准脚法射门,但却无法像梅西一样带球越过防守队员。在图灵测试中,计算机和人分处不同的地方,身体因素被排除在外,一定程度上也摒弃了人类的基本特征,而意识是关乎体验的,因此,“缸中之脑”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人,体验才是意识的前提。

3. 方法论层面: 机器伦理与机器人伦理

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目前已有的人工智能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主要被设计用于执行特定的任务,如驾驶汽车、护理老人或识别敌对目标等;从长远来看,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希望创造出通用人工智能(AGI),它能够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任何任务。也有人将其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理论上讲,强人工智能或者通用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思考和推理,并具有感知和意识。甚至有些学者推测,一旦开发出足够智能的机器,它就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智能系统,超级智能机器将远远超过的人类能力,导致“智能爆炸”或“奇点”。

与之相应,目前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两类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机器道德化,使得机器可以自主地做人类认为正确的事;另一个问题涉及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我们能否控制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有学者提出把机器人伦理学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分别是“机器伦理学”(Machine Ethics)和“机器人伦理学”(Robot Ethics)。其中,“机器伦理学”主要关注机器如何对人类表现出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机器伦理是机器的伦理,是“有道德的机器”的伦理,是机器作为道德主体的伦理,而不仅仅是人类将机器作为客体使用的伦理。“该领域的一个核心张力是创建人工主体的主体与人工主体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谁对使用这些系统的行为和后果负责、受罚和承担义务。”机器伦理的一些讨论建立在这样的预设基础上: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对其行



为负责的道德主体，或“自主的道德主体”。机器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被应用到现实的机器人技术中，如计算系统的控制问题、智能主体的道德要求和权力边界以及既智能又道德的系统设计等。总而言之，机器伦理旨在为未来具有感知和意识的机器设计提供道德支持。

“机器人伦理学”主要关注人类如何在设计和使用阶段与这些机器交互，包括机器本身运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及人类因为机器人的介入而产生的伦理问题，如军事机器人、社交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性爱机器人等等所带来的一些道德风险和挑战。机器人伦理学将各种应用工程伦理问题整合进机器人伦理之中，“机器人伦理学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对机器人的感觉与信念问题”，关乎人们如何识别机器人、如何对待机器人（将其视作机器还是动物）所涉及的一系列心理以及行为和方法。有学者从临床角度考察人与机器人的情感关系，也有学者试图理解与定义情感仿真机器人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还有学者考量在哪些境况下，我们会作出救机器人而不是人这样的决定。迄今为止，这一领域主要由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主导。

简而言之，“机器人伦理学”与“机器伦理学”都试图为人机关系提供道德支持。机器伦理主要是关于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道德主体，从狭义上来看，主要是涉及机器的设计与生产，从广义上来看，则从机器的生产问题过渡到人的整个生活世界。而机器人伦理主要是关于如何善用人工智能，如何进行负责的创新

和应用，某种程度上，“机器人伦理”主要是回应“机器伦理”在面对机器高度智能化、人机交互不断深度化与广泛化时所提出的问题。而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伦理问题既包括机器伦理，也包括机器人伦理。“AGI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伦理挑战：第一个是如何打造一个行为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第二个伦理挑战是如何在伦理层面使用它。”第一个层面涉及机器伦理，第二个层面涉及机器人伦理。在以上这些讨论中，也蕴含着两个核心问题：（1）道德是有逻辑的吗？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具有意识和自主性？这将是一个事关机器人伦理能否编码，能否创造具有道德的机器人的核心问题。（2）机器人是否有身份？机器可以成为道德主体吗？人工智能如果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学习、接受信息并作出判断和决策，我们能否将其视为平等的人呢？

意识和自主性常常被视作道德主体的必要能力，尽管这对于智能机器人的创造来说仍是前途未卜的，可是依然有很多人致力于制造有意识的机器人。至少，现在有人开始从理论上探讨人工智能伦理设计的可能性，温德尔·沃勒克（Wendell Wallach）和科林·艾伦（Colin Allen）在《道德机器：教机器人分辨是非》中，提出了机器人伦理设计的三种进路，分别是自上而下的进路，自下而上的进路以及混合的进路。其中，自上而下的进路意味着选择某种预设的道德规范或者原则，以此为基础对任务进行分解；自上而下的进路则要求机器能够在不断



学习和反复试错中完成自我进化，在具体的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建构理论模型；混合策略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荷兰学者马克·科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则从人与机器人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机器人伦理，他认为可以从人与动物的关系扩展到人机关系，更加关注机器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对人类的表现，以此来推动机器的设计和研发。杜严勇指出：“可以更具体地把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分为四种：观察关系、干预关系、互动关系和建议关系。”还有学者提出了“价值敏感设计”，在实践中考虑到技术设计过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把机器人的使用语境与设计语境紧密联系起来。这些研究中已经有了“关系转向”的迹象，只是还没有清晰和明确地表达出来。

4. 价值论层面：人机关系与人类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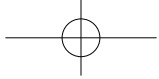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概括起来，关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即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和现实主义。

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坏事，人类将受益于人工智能。比如库兹韦尔通过对计算机发展和大脑思维的分析，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可能通过物理手段制造出媲美人脑的非生物型智能机器，并且可能会超过人脑，人类与机器会结合成为全新的物种。他反复强调了加速循环规则，认为信息科技的发展会导致存储能力、计算能力、芯片规模等暴涨，从而引起指数规模的变化。“我的核心论点，也就是我所称的加速回报定律，是信息科技中的基本理论，它遵循可预见的指数级增长

规律，反对传统的认为‘你无法预知未来’的观念。”他认为正是通过这样的技术，我们才有能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奇点，进而人工智能会控制和操纵人类，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有些学者认为超级人工智能系统只是一个理性的终极理想，机器无法取代人类，“人类希望通过逻辑工具来建立冷静客观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不应该有任何主观的知识和情绪夹杂在其中，但问题是一旦有了的体系，并且这样的体系可以自动去包罗万象而形成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人本身的作用就不大了。”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展示了即使数学系统的理性也会受到限制，科学也无法发现所有真理，认知总是会有边界的。况且，人之所以为人，除了那些理性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些感性的部分是无法被理性取代的，而这些感性的、直觉的、情感的、体验的部分才使得人成为人，并与机器区别开。

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大量的机遇，要善用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方面，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怕人工智能发展太快，怕的是越界，要充分思考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一种观点是人工智能应该进行伦理，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其中，社会和法律主要是现实层面的举措，体现的是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实然关系，而伦理层面更多地具有前瞻性，体现的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应然关系。



二、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的困境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挑战我们数千年来进行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方式。我们应该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进行人工智能伦理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并不擅长预测技术的出现,所以,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更多的不是解决人工智能产生的特定技术和伦理问题,而是澄清问题的前提,并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调整提问问题的方式。一直以来,在规范伦理学领域,义务论、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学等理论和立场的胶着一直存在,对一些一般的道德选择我们尚且无法达到共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么复杂的充满挑战的技术实践中,一致性、统一性的道德诉求能成功吗?实际上,人工智能伦理的规范路径研究面临一些困难,概言之,主要有概念的模糊性、认知的有限性、情境的复杂性与道德选择的不确定性。

1. 概念的模糊性

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涉及很多不同的范式,因此出现很多术语的歧义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也包括主体和主体性、智能体、自主性和意识等关键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梳理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义,但可以看出,当今关于这些概念争论的焦点和根源在哪里。

在传统哲学中,一般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人的意识和活动才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一词一般用来指主体作出决策、执行行动并对行动

负责的能力。这个概念意味着主体必须是具有理性的认知、思考和行动能力的,并能根据复杂的环境变化自主地采取相应的行动且为之负责。在人工智能哲学中,拥有意识和自主性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设想对主体和主体性等概念提出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能体”成为现代人工智能的核心主题,智能体与主体的关联变得紧密起来。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主体(agent)具有行为实体的特征,只要能有效控制并进行一些操作活动就可以是主体。但是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些行为主体的意图是从外部发出的,这意味着人工智能自身不会自主决定并开启行动,也不具备自我理解和反思能力。另外,从对行为后果的态度看,哲学中的主体与人工智能、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主体也有显著差异,前者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预期,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后者则不具备这种能力。机器或机器人如果具有自主道德意识并能为自身行为负责,那固然是可以称之为“道德主体”,但即便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归属讨论得热火朝天,也依然很少有人认为,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后果。这意味着,主体与自主性在人工智能领域还远未成为共识。

2. 认知的有限性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相应成果的科学解释也面临挑战。尽管人工智能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科学知识,但是却并没有因此增加对身心关系等问题的本质理解,甚至,认知危机还



会演变为道德危机。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数据增长的速度和幅度以及数据处理的程度都远超原来最优秀的科学家的计算能力，这些对我们传统的科学知识和因果关系提出挑战。大数据思维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以及不确定性，也使得我们对原有的科学理解方式产生怀疑。虽然计算机在某些能力上已经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对机器的功能却无法解释或理解。对在此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伦理，则更需要谨慎。

认知的有限性源于机器学习与人类思维的有限性与脆弱性，并可能带来一些伦理问题。这些有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机器学习会造成信息冗余，引发道德风险。机器学习在数据采集和数据挖掘的过程中，会造成个人信息遗漏，从而侵犯个人隐私权。比如，面部识别技术可能会大大提高分辨人群的效率，但是可能也会带来数据歧视的风险。机器学习还会产生垃圾数据、错误数据以及信息冗余，造成模式识别的“过度匹配”或者“不匹配”的问题。另外，深度学习是一个黑箱，会引发诸如可解释性、透明性和信任等问题。（2）合乎道德的机器设计存在很大争议。当前的机器学习系统更多是弱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缺乏对世界真实特征的理解，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道德感。虽然“机器伦理”致力于解决“道德编码”和“道德嵌入”的问题，从而设计出行为合乎道德的机器，但是难点在于，很难知道是否以及何时应用了这些道德原则。更有挑战的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

嵌入的义务论、功利主义或者美德伦理是正确的道德理论，何况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境，即便是道德主体，在特定情况下会做什么也很难确定。

（3）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脆弱性也造成认知的局限和对自身的伤害。比如，利用生成性对抗网络，可以从现有数据集中生成新类型的数据，制作逼真的视频。这些所谓的“深度伪造”（如AI换脸）很可能会发展到我们很难辨别真伪的地步，由此带来的新型犯罪会给当前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另外，机器人的自动化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当前人类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对我们不利，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3. 情境的复杂性

无论使用何种规范性框架来模拟机器的道德判断，其前提都要取决于道德决策所依据的道德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原则和路径从来不是统一的范式，而是与长期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有关。理论上的规范性与实践情境中的差异性导致了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复杂性，伦理原则的相对性与实践的有效性之间，也一直存在一种张力。这也使得伦理学家提供的道德困境解决方案可能不但不会被人工智能专家接受，甚至也会被公众拒绝，毕竟对一些人来说是有价值的道德选择，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无效的。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实践和应用中，因为道德情境的复杂性，也使得人工智能的伦理设计变得复杂。宏观地讲，经常会出现过于高估或



者低估人工智能的情况。高估人工智能风险可能有两个向度的表现：一方面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生存，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拯救人类于危亡之中。由埃隆·马斯克创建的Neuralink公司，目标就是在我们的头骨中植入芯片，以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从而“拯救人类”对抗人工智能。然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如果这些技术可行，那么这些技术的拥有者就有可能将他们想要的信息附加在大脑中，并因此控制大脑的思维。这到底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还是拯救？另外，还有些人出于“善意”的目的，想通过人类增强技术延长人的寿命，但是这也会导致出现“数字分身”或者“智能增强”后的新物种。如此一来，技术进步的加速定律将不可逆转地改变知识生产的体制，并创造出谁都控制不了的技术物，对于这样的结局，人类显然没有充足的准备。

而低估人工智能的风险，主要是认为人工智能威胁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夸大，人工智能充其量只是机器模拟，不可能具有意识和情感，不能跟人相提并论。问题是，一般的技术物尚且具有结构意向和功能意向，起到类似主体的调节作用，何况经过深度学习后能产生新类型的智能机器呢？比如在护理机器人和性机器人中，即便用户理智上知道这是机器人，但是从情感上，依然“愿意”把它当作真实的“伙伴”或者“家人”，或者宁愿选择机器人而不是人作为伴侣，更多地依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是思维来决策，这又该如何面对机器人的道德主体性呢？推而广

之，对机器人地位和作用的界定不在机器本身，而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之中，又会对我们的道德和法律体系以及社会秩序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这些问题构成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责任鸿沟。人工智能并未真的达到主体需要的关键能力，但是，人类还是把一些任务外包给了机器人（诸如驾驶汽车、陪护病人等）。在这些情境中，谁应该或者可以对某事负责却并不清晰。另外，除了不同类型的责任鸿沟之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还可能导致人们所谓的“义务鸿沟”。不管机器再智能化、自动化，义务通常还是归因于人类主体，机器人本身没有义务，因为只有人具有自主决策的能力。比如人类在驾驶汽车时造成伤害或者事故会受到处罚，但是，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却不会因此受罚。能动性和自主性是理性主体的属性，想象一下，假如存在一种哲学意义上真正具有自主性的军事武器，它会自行选择目标，那不仅对平民来说是一场噩梦，对军事人员来说也难以接受，因为他们也需要能够完全控制和信任的武器系统。在人工智能中，使用道德主体这样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机器具有责任和义务，所以将机器道德化只能是一个半截子工程。

4. 道德选择的不确定性

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其他学者也建议，我们应该确保超级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和目标与人类的一致。但是实际操作中，机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如何将机器道德化？这些难题不仅仅是实践难题，也是理论难题。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



理学等伦理理论一直存在着分歧，这意味着将这些理论直接编程到机器中并不可行。

让-弗朗索瓦·邦内丰 (Jean-François Bonnefon)、阿齐姆·谢里夫 (Azim Shariff) 等学者认为，即使伦理学家赞成应该用哪种道德原则指导道德算法，但如果外行强烈反对他们并决定不使用该算法，则对他们的工作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安德里亚·洛雷吉亚 (Andrea Loreggia)、尼古拉斯·马蒂 (Nicholas Mattei) 等学者从计算机科学的视角介绍了如何构建具有道德行为的智能系统。[1] 斯蒂芬·沃尔夫拉姆 (Stephen Wolfram) 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将沃尔夫拉姆语言打造成一种计算通信语言，从计算机科学角度阐述了如何构建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定义了人们希望人工智能如何行动及其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在人类目标和计算能力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毫无疑问，在机器中引入人类价值观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意味着让机器按照人类的道德行为的标准来行动。然而，由于机器并不理解人类的意图，只能根据外部指令来行动，从这一点上看，机器延续了人类道德选择的情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且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行动，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无法反思行动的意义，所以并不能构成真正的自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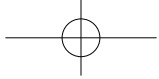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三、“关系转向”视角及其展开逻辑

从前面的论证可以看出，人机关系是机器伦

理和机器人伦理的核心问题。当前的讨论方式总体还是偏实在论的，且都离不开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虽然有时机器被赋予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却还是回到为人类服务的“客体”的立场，尚未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对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进行前提反思，打破惯性思维 and 传统，才是哲学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看，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关系转向”：这种路径更多是现象学的、经验主义的视角，它基于身体主体而不是我思主体来看待人和机器的本质，从情境化视角来看待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知识生产以及伦理学和认识论，从开放的理性和复杂的范式出发进行负责任创新，从人机共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来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关系转向在哲学上并非新生事物，但是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或许能通过改变提问问题的方式，进而推动相关研究。

1. 从身体主体看待人与机器的本质

在人工智能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与机器的界限。机器是否/应该具有主体性，或者是人工智能体是否/应该具有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事认识和实践的人，客体就是被人所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哲学的展开，技术现象学的观点越来越被广为接受：人是通过技术栖居于世的，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到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人工智



能的发展又将技术的积极的调节作用推至前台，甚至通过技术内化于人与世界，直接改变着我们对人和世界本身的认识，由“一技术—世界”过渡为“技术化的人—技术化的世界”。当我们考虑将主体归因于任何机器人，应该考虑到以下因素：其一，主体有哪些特征？其二，主体一定是人吗？人类是唯一的主体吗？其三，如果机器可以算是主体的一种，那是什么意义上的主体？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主体和客体需要一些新的探讨。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存在严格的人和物的区分，只要对一个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都可以成为行动者(actor)，这个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是多元主体(multi-subject)。按照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的观点，技术物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一种道德主体，起到类似主体的作用，也叫作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哈拉维描绘了“赛博格”(cyborg)这样一种人、机器和动物的混合体，也有人把这个叫作后人类形象。在环境伦理学中，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到生物平等主义，再到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关怀的主体不断扩大：人、动物、植物、生态都可能是伦理关怀的主体，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更何况随着以人工智能技术、新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改变的是人类自身，所以，当今的主体更多是一种身体主体，一种多元主体，一种人、机器与动物的混合体。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身体主体是与实在论背景下的我思主体相对而言的。我思主体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背景下的，身体与心灵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身体主体是建立在“涉身自我”的基础上的，“身体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不仅仅是一副由生理组织构成的血肉之躯，而是呈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流动性、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1]这样一种主体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一种知觉的主体、体验的主体，也是一种多元开放的主体。身体主体为技术和机器对身体的改变留下了空间，但是却不能将肉身完全让渡给技术。身体主体是涉身的，体验的，是有自我反思能力的，是肉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对身体的整体知觉之上的，体验恰恰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所以，当人们说“机器人”的时候，是在拟人的基础上使用的，在这一点上，机器人跟其他的技术物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身体主体这一视角出发，会发现技术和人是相互构成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并非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它们是关系之中的产物，它是主体还是客体，取决于我们与机器之间的关联。当我们需要机器人按照人类的想法行事的时候，机器在执行客体的职能，但是，倘若只把机器当客体，不仅会产生认知偏差，也可能会引发道德争议。波士顿动力公司曾发布一段视频，一个名为“斑点”的机器人狗可以在跑步机或楼梯上跑步，为了说明机器人保持平衡的能力有多好，公



司员工在视频中踢了机器人狗，此事引发了观众的争议和负面意见，认为人残忍地或不公正地对待了机器人。

关于人机关系，“工具论”提供了最广泛接受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为用户服务的“工具”。但也有学者指出，计算机系统是由从事社会实践和追求意义的人们生产和使用的，“无论未来的计算机系统如何独立、自动和交互，它们都将（直接或间接）是人类行为、人类社会制度和人类决策的产物。”[2]为了让一件技术物完成它的使命，它需要被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被人类奴役的对象和工具。康德曾指出，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手段。当我们谈论人类时，我们是指作为人类的整体，不仅有人类的思想，而且有人类的身体。“人类”指的是“我们独特的身体、大脑、思想以及生物和文化特征”。[3]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可以被机器改变，而是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变得更好。若是人类将机器人作为主体，那么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让机器的行为更加合乎人类道德，而是人类对机器人本身是否给予了必要的尊重。

相互性原则可以从人伦关系推广到人机关系，对机器人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类的尊重。人机交互的伦理不仅仅是机器人取代人类的伦理，还提出了很多需要伦理学进一步思考和创新的哲学问题。比如，机器人应该如何存在？人应该如何驾驭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人应该如何与机器人互动？这些都是讨论人机关系避不开的话题。

2. 从情境化知识看待人工智能的伦理地位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叠加效应下，未来更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提出了重要挑战。计算数据知识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方性的，既是客观实在的，又是具有文化多元的。数据本身似乎是客观的，但在数据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习惯、隐私等等不同元素的博弈。大数据思维对事物的理解，使得相关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成为理解知识的前提与依据。

哈拉维曾经提出“情境化知识”的概念，用来表示知识的强客观性。“情境化知识”意味着“局部的视角”和“负责的科学”，意味着我们为了更好地了解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就要认识到每一个视角、立场、观点的局限与价值，并进行负责的有理有据的批判。针对机器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问题，现象学的关系思维给出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案，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基于不同的道德立场看待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向他人开放并能够容纳他人的道德差异。在存在论看来，人类的本质是与生存境况相关联的，是“在世之中”的存在，而构成“生活世界”的因素，可以是人（包括他人）、动物、环境、组织和技术物（如人工智能）。由此出发看待人工智能的道德和法律地位就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改变了辩论的条件，变成：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到底是源于内在属性，还是社会建构？由此出发，问题就从“是不是”这样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层面的讨论，变成“该不该”这样一个伦理



学的价值层面的讨论。“人工智能能成为一个道德主体吗？”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就可以转换成“人工智能应该是一个道德主体吗？”这样一个伦理学问题。而“该不该”这样一个应然层面的问题不是根据事物是什么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事物在实际社会情境中与人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的实践特性优先于个体或物质实体的表象特征。这种视角的变化会带来许多重要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仅会影响人工智能伦理，也会影响到道德哲学的发展。

从情境化的视角看，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目前的人工智能伦理都默认了这一前提：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伦理理论，都是为了通过调整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使他们更好地与人类互动，也就是说，人类通常是以人类为中心去思考人与机器关系的。如果机器人有朝一日能够体验痛苦和其他情感状态，那么建立这样的系统是否合乎道德？对此，斯文·尼霍尔姆（Sven Nyholm）指出了另外一个路径，就是人类也可以朝着更好地适应机器的方向发展。“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把外表和行为都像人类的机器人视为有尊严的机器人，而不仅仅是工具或仪器，这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同样，这将是一种使我们的行为适应机器人的方法。”人类主动适应机器或机器人并不是本末倒置，或者将人置于不人的境地，而是在关系中生存的智慧。比如，在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带有人工智能的汽车可能会变得比人类驾驶员更安全、更高效。人与机器的互动方式有个互相适应

的过程，他还论证了我们需要适应机器人的条件：“如果满足以下条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选择让自己适应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1）对受影响的人类有一些明确的和可识别的好处（例如，人类更安全，我们的自然环境得到保护）；（2）我们适应机器人的方式是非接触的和/或无创的（例如，我们不需要将大脑刺激技术运用到我们的大脑中，但我们可以使用许多非侵入性技术手段）；（3）我们尝试使自己适应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方式仅在特定的领域（例如，交通领域），并且不会蔓延到生活的太多其他领域；（4）我们适应机器人的方式总体是可逆的。”

在现象学的关系思维中，关系优先于实体，关系思维比实体思维更加根本。不仅人与机器的交互方式需要思考，即便对同一个人工智能体，从关系的角度看，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道德地位的决定和授予不是基于主观或内在属性，而是基于客观可观察的外在关系”。马克·科克伯格也进行过类似的表述，“‘道德考虑’不再被视为实体的‘内在’考虑，相反，它被视为‘外在’考虑：它被归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的实体。”因此，任何人/事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于某人或某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决定、行动和回应。继科克伯格之后，安妮·格德斯（Anne Gerdes）将类似“关系优先于相关事物”的表述称为伦理学中的“关系转向”。以护理机器人为例。对一个与护理机器人建立了



深刻的情感链接的用户或者主人来说，护理机器人绝对不仅是工具，更是一个交流的对象或者感情的承载，这对他/她来说无疑就是具有道德地位的，可以视为道德主体；而对一个工程师或者机器人生产和销售企业来说，护理机器人就是物，是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商品，那护理机器人对他们来说就不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抛开特定的情境去讨论人工智能是不是具有意识和情感，是否是道德主体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肉身的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有人的情感和意识。对人工智能这样一个特殊类型的物来说，“关系优先于物”可以说是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转向。因此，不必非要争辩出一个一致性的、统一性的答案，就像当今的数码艺术，对于技术人员可能就是技术物，对于艺术家来说则是艺术品。将它看作是什么，既与物有关（是这个数码艺术品而不是那个），更与主体和世界的关联有关（是技术物还是艺术品），甚至某种程度上，后者更加具有优先性。

3. 从开放的理性看负责任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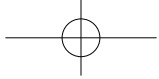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文化与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科学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当今时代，“技科学”的产生意味着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的发展也受益于技术仪器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技术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技术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会异化成为意识形态。从技术的功能来说，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它会有价值负载。从技术的产生来说，技

术不是线性发展的，而往往是由社会因素建构的，或者温和一点说，技术与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一种无缝之网。再次，技术与人相互构成。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是良药也是毒药，我们发明了技术，技术又反过来构成人本身。

技术与非技术因素的交织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开放的理性，才能更好地面对和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演化。开放的理性具有以下两重含义：首先，开放的理性有能力包容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承认批评是理性生活的前提。其次，开放的理性还意味着，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建议亦须合乎理性，有理有据。“这个世界需要负责的批判。我们需要超越科学的规范模式；科学的不完全和适用范围需要被解释和探索。”[9] 这样才可以使科学既摆脱教条的束缚，又有一定的限度，而保持一定的张力。

负责意味着科技工作者、人文社会学者的合作，也意味着学校、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共同参与，各司其职。不管是从哪种立场出发，我们都要审慎地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当代科技哲学研究所要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比如，科技伦理研究不是要限制科学家的学术研究，而是为科技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和规约，使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出更安全、更人性、更容易被社会接纳的科技产品。伦理学应该为科学家提供伦理反思的工具，帮助科学家更全面地了解科技产品的社会影响，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从关系出发对机器人进行伦理设计，意味着要考虑到人类道德情境的多样性、机器人技



术创新的复杂性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广泛性等。未来社会是一个各个学科相互协作的社会，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与技术哲学都需要深入探索负责任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前沿性的知识、智识与科学，它需要几乎所有的理工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交叉性研究，也需要研究者、实体技术者与产业者等各个领域的人配合与对话。”近年来产业界开始丰富“伦理嵌入设计”的路径，推动负责任创新。“机器人伦理设计必须要具体化、语境化、实践化。……比如，在军用机器人领域，应该更多地采用‘自上而下’进路强调安全性问题；在社会机器人领域，需要从关系论的角度重视人与机器人的互动问题，等等。”总之，需要根据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情境下的人机关系，对伦理设计的理念与路径进行动态调整与评估反馈。

4. 人机共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次科技革命给人类自身带来严峻挑战。在人类世时代，机器人将成为我们生存的一部分，人与物质、自然与文化、技术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将被重新界定。模仿人类的类人机器人整合了物质、技术、生物学，将挑战人类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他们与我们在工业自动化中熟悉的机器人不同：在工业自动化中，机器人完全由人类控制，受到环境的制约，并确保工人的安全，但类人机器人被释放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会发生什么呢？对此，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洞察和分析还非常有限。“人类社会中机器人生产

和实施过程中潜在的人—机交互以及主客体关系的复杂协商的分析，是通过广泛的切入点与人类存在集合在一起，并将社会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新伙伴展开的。”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我们什么都不做，面临一些生存风险，要么通过一些技术或者道德的手段改善人类，以便更适合未来。人类已经被置于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当中，如何更好地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我们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思人和技术的关系。海德格尔提出，面对技术的风险，希望用艺术的沉思来作为救赎；马克思主义希望人能够摆脱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当今时代，被技术武装和塑造的人类是人、机器和动物的混合体。人和机器之间不是非此即彼，只有一方存在的僵化的封闭的关系，而是相互统一的。机器永远不能够取代人类，但可以是身体主体的延伸和扩展。我们不应该在机器人伦理和机器人伦理中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既不是让机器成为自由的道德主体，也不是让机器按照道德规则合乎道德地行事。相反，人工智能存在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人类变得更加明智，更加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在行动时更加负责。因此，我们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角度去思考人的发展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人和人的关系，也不只是国与国的关系，它还包括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关系。只有人和机器、人和技术和谐共处，我们才能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走进元宇宙的艺术

金江波

元宇宙，是出自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所创作的小说《雪崩》里的一个名词，它本身并不是一项新科技，而是一个整合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多种技术于一身的平台。它无限开放，特别强调虚实相融，具有沉浸式体验、虚拟化分身、开放式创造、强社交性等特征。

既然元宇宙充满着无限的诱惑力，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走向这个虚拟世界呢？

元宇宙之所以会有这种强大的诱惑力，我想可能和人类对未知与真理的渴望有关。但是世界上哪有绝对不变的真理。就像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毕竟，我们人类本身也一直在变化。从原始社会的原始人，到农业时代的自然人，到工业时代的现代人，再到信息时代的新人类，最后，是不远的将来，身处于AI时代或者说元宇宙中的新新人类。

显然，这种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科学、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动力正在成为改变当前人类身份的不可抗力，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改变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

既然，人类未来的身份在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以及非有机生物工程的加持下，必然转变为新新人类。那么新新人类究竟能够做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我想新新人类大致会拥有以下几个可以预见的特征，比方



说：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深度的知识学习能力、敏锐的环境感知能力，以及迅速的空间传送能力，他的物理形象可以是一人千面，而他的精神状态甚至可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在我看来，新新人类可以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超能力，实现脑控或者眼控生活，通过视觉传感、声音传输、脑波控制等方式决胜未来。眼下，为了实现这些看似不可能的超能力，于是便出现了AR眼镜、VR产品、多角度的裸眼三维屏幕、感知握持手柄，以及机械控制手臂等。

既然，新新人类对于信息内容、视觉形象、物理空间的个体经验和感受方式完全区别于以往存在于旧时代的人类，那么这样的人类究竟会如何进行艺术创作？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

于是，我们首先看到了NFT艺术。这是2017年，由Larva Labs工作室，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推出的数字艺术作品。基于算法随机生成的1万张各自不同的像素头像。这批经过加密技术处理的朋克头像，早期是可以在线上免费领取的，而现在只能通过市场购买。在今年的早些时候，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其中一张像素头像甚至拍出了约2370万美元的天价。

虽然，比起传统艺术家们的作品拍卖金额仍有差距。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前者的艺术创作方式，它最终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家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投入。毕竟，它的本质其实只是由计算机算法随

机生成的数字图像组合，且像素仅为24 x 24。

NFT艺术的出现，不仅从创作方式上颠覆了传统艺术创作，基于长期审美训练形成的艺术判断。比方说中国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在八九十岁的时候其个人的艺术造诣才趋于成熟。而基于计算机算法的艺术创作，显然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技术迭代。

此外，NFT艺术的出现，也从艺术家的成长角度颠覆了传统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家个人的了解与接受。就比如梵高一生据说只卖出一幅画，而NFT艺术却让不少数字艺术家一夜成名。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当代艺术家甚至是网红也开始进入NFT领域。

在艺术收藏领域，NFT所体现出的亲和力则让更多的普通艺术爱好者拥有了收藏世界名作的机会。因此，参与NFT艺术的文化机构几乎涵盖了所有享誉世界的美术馆、博物馆。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则开启了世界名画的NFT拍卖活动。拍卖作品包括了达·芬奇、拉斐尔、莫奈、梵高等诸多画坛巨匠的名画。据举办方表示，本次拍卖的原画作将仍旧保存在冬宫博物馆，而根据真迹复刻的每件高清NFT数字艺术作品都有两个副本，其中一个将存储在博物馆内展出，另一个将在数字艺术品平台币安NFT市场拍卖，每个起拍价均为10000 BUSD，折合为9997美元，参与者需要先购买足够的BUSD才能参与投标。



如果说，艺术走进元宇宙始于NFT。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还远远不止于此。毕竟我们看到的大多数NFT作品，还停留在二维平面的物理空间。而随着元宇宙支撑技术的不断加速迭代，从现实世界的物理空间向元宇宙世界虚拟空间的迁移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新的无边美术馆对于旧的数字美术馆的替代计划、新形式的艺术表演对于传统艺术创作方式的冲击，以及艺术治疗的可行性尝试，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在传统的艺术欣赏过程中，似乎永远会有一层薄纱阻碍着我们获得作品的完整性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艺术的体验永远会被某些因素所排除在外，这些因素或许是保护作品不受破坏的玻璃外框、或许是我们与画框之间的物理距离、可能是美术馆的各项安保措施。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本身对于作品补充性知识的缺失。

曾经的数字美术馆，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但是，从它最后所取得的结果看来，数字美术馆对于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依然乏力。于是，我们看到了新的无边美术馆对于旧的数字美术馆的替代计划。因为，只有在无边的美術馆中，我们对于艺术的体验才不会被这些因素所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好，还是当代艺术创作也好，我们都可以和艺术作品直接实现同频互动。我们不仅能够进入画中的世界，而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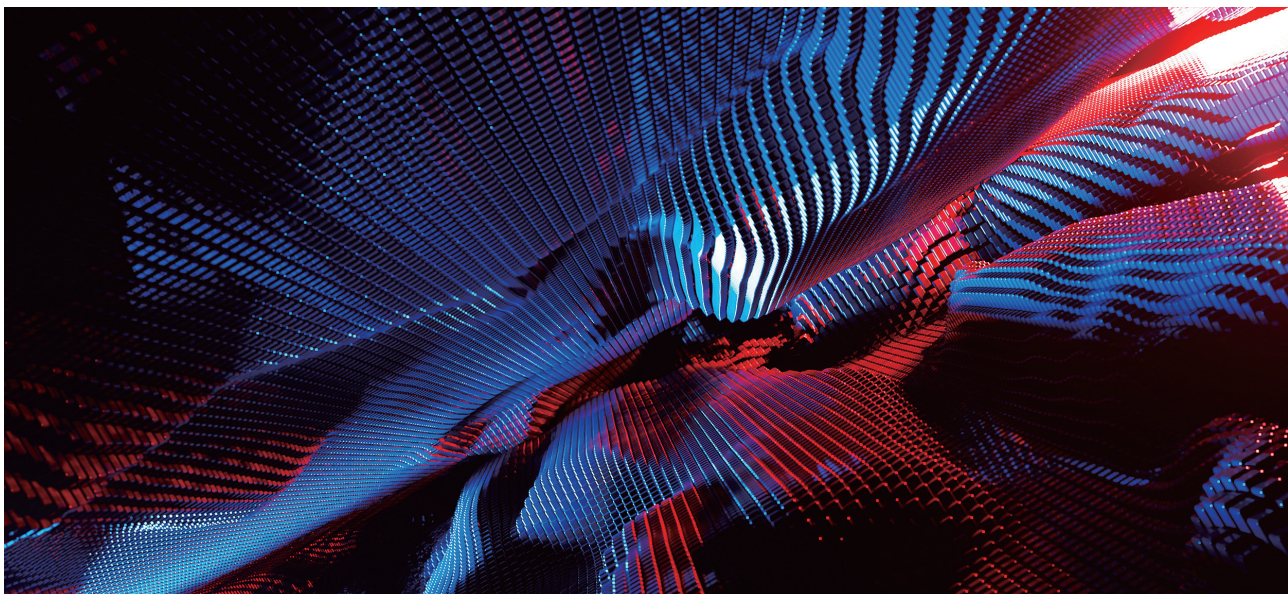
中的人物也可以走出画框，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甚至可以参与修复人类伟大艺术作品的全过程，因为，在元宇宙中，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从过往的经验中获取线索，也可以在未知的可能中寻找答案。无论是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也好，还是久经风霜的长城。元宇宙赋予了我们保存并延续人类文明的希望。

在这项极具野心的计划中，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该项目的参与者。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打造的《云游长城》项目。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元宇宙世界中，创造更伟大、更丰富、更新鲜的艺术内容与文化价值。

其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则是美国说唱歌手Travis Scott在堡垒之夜中举办的演唱会。此外，元宇宙中的艺术不仅涵盖艺术创作、艺术体验，同时也包含了人文关怀。我们可以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新的治疗方法，这是XR Creator Studio与儿童医院合作开发的项目，用于长期患者的艺术治疗。而由土耳其艺术家阿纳多所创作的作品，不仅再现了回忆流动的形态，也让我们开始关注阿茨海默病患者。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不妨看一下这段视频。我甚至有预感，元宇宙中的艺术疗愈项目将改变当前医院连接模式，同时也将彻底改变目前就医逻辑以及医患关系。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人们触及元宇宙疗愈项目的获得感，



将比元宇宙娱乐来得更为真实与迫切。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元宇宙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乎技术的平台，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关乎艺术的平台，或者说元宇宙本身就是艺术。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元宇宙中的任何行为，其结果似乎都能成为新的艺术探索或者是艺术创作。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算法，通过艺术家的个人观念和计算机的数据编程，形成的艺术作品。而这类作品，则通常被人们称之为生成艺术。

“生成艺术”通常指的是算法艺术(由算法决定的计算机生成的艺术作品)和合成媒体(任何算法生成的媒体的通用术语)，但艺术家也可以使用化学、生物、力学和机器人、智能材料、手动随机化、数学、数据映射、对称、平铺等系统来制作它。事实上，随着新的艺术形式的出

现，必然也会受到一些争议。许多保守主义者就认为，这类依赖于计算机算法的艺术创作并非艺术。相反，以阿瑟·米勒为代表的激进派却认为尖端科学其实是可以重新定义现有的艺术，正如他在《碰撞的世界》一书中声称“创造力是可以被解开的”。

对于这个观点的看法，我其实非常喜欢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艺术与科学总是在山脚下分手，最后又在山顶上相遇。所以我相信，在元宇宙中，我所强调的新新人类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新艺术作品。而这些作品，又会颠覆现实宇宙的规则、价值、哲学，甚至是伦理。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虽然人类的衰老和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拥有着超能力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意识思想将在元宇宙中永存。



让每一个人遇见最好的自己

张园勤

对一所新学校而言，如何迅速打开局面，在短时间内获得师生、家长、社会的多方认可是一个挑战。过程中又如何做到目标一致、上下齐心，提质增效，更考验学校管理者的能力与水平。我认为一所优秀的学校则必须具备强大且独特的气场，它是学校能够稳定长远发展的“保护罩”。而强大的气场则来自于学校里的“人”，以及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办学质量还是育人效益，都是“人”通过做“事”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

我一直很推崇“让每一个人遇见最好的自己”这句话，它略带诗意，不仅是华政附校的办学理念，也是我理想中教育的样子。这里的“每一个人”不仅指学生，也包括教师和家长。最大程度地成就每个人，无悔少年与青春，无憾有限的生命，是我们学校所有教育哲学的起点。而校训“让知道成为做到”则为实现这样的教育理想提供了路径。

因为华政附校有着天然的“法”的属性，因

此打造以“法”为中心的办学特色恰如其分。记得学校成立之初，负责课程建设的副校长愁眉苦脸地来到我办公室诉苦道：“校长，学校对外宣称要打造法治特色，可是究竟要从哪里着手啊？”一个问题令我陷入了沉思：一所新学校，基础型课程尚未站稳脚跟，如果现在就要搞特色课程，显然是喧宾夺主。在足足思考了半年之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对我们学校而言，只有在国家课程基础上做整合与创新才是办学特色的根基。于是，我们组织50余名教师，历时近三年时间，以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学科为主，统筹推进学科育人。通过深入挖掘中小学多门学科教材内容中法治内容或延展点，研究法治教育的衔接及序列化的教学实践路径，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构建了学段衔接、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校本课程体系，形成30余份优质法治教案。其中有5份优质法治课例被编入《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与指导》六年级上册。

在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里，面对的教育对象差异很大，如何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定制课程？必须



遵循儿童与青少年的发展规律，遵循教育规律，为未成年“人”搭建学习，即做“事”的必备条件。为此，我们整合各方资源围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建设了学校“晓法课程”法治特色课程群，序列化推进“必备品格+良好行规+法治素养”的养成教育。

“晓法”课程中的“晓”代表了“通晓”“知晓”与“明晓”，分别对应三类课程的不同学习维度。

“晓法”课程的“法”代表了“社会之法”“学校之法”与“家庭之法”，是学生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不同主题情境中去做“事”的准则。去年年底，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张校长，我家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玩手机，怎么说都没用，不仅睡眠不足，学习也耽误了，这可怎么办？”第二天，我马上紧急召开了班主任、学生座谈会，了解到手机失管现象果然普遍存在。我们组织政教处、大队部、团委共同制定了关于手机管理与睡眠管理的《翔鹰计划决议》，并由学校的“模拟人大”审议通过。其中有一条是让学生与家长共同签署“手机使用家庭公约”，实行家庭与学校双重监督、双重奖惩方法。决议是发下去了，我心里其实很忐忑，不知这个方法是否奏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收到那位家长的短信：“张校长，我家孩子最近戒掉了手机啦！精神好了很多，成绩也上来了，谢谢学校让我们签订的家庭公约，孩子目前还当选了‘模拟人大驻班调研员’呢，他说要遇见最好的自己。这件事让我也受到了教育。”我悬着的心随之落地，看来我们用行动印证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古训。

在尝到甜头之后，我发现“依法治校”就是学

校“人心向齐”的法宝。记得学校刚成立不久，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几天人事干部总要愁眉苦脸地跟我抱怨，她总是在处理各种咨询与投诉，老师们总是理不清工资构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口口声声说的“公正公平”“多劳多得”怎么变成一笔糊涂账了呢？维护教师权益是实现学校民主管理的重要表现，一定要把“知情权”还给老师！于是我们为每一位教师定制了个性化的“个人岗位细目及工作量认定表”，从学科教学到教育管理共计24项内容，含超减课时折算及总系数，所有可计价的项目一目了然。每学年期初，我都亲自与每位老师一对一地面谈沟通，郑重地告知其将在这一学年中承担的所有工作任务，并由教师完成确认签字。看似“公对公”，其实隐藏着我的“私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感谢每位教师接受学校安排的岗位，更是乘机了解每位教师内心想法与需求，有时也会帮助解决一些困难，给一些建议，无形中也拉近了与老师们的距离。尊重每位教师的劳动付出，就是对这项职业最大的敬重。

记得建校第一年之初，我去一所小学进行招生宣讲，被无数家长质疑学校的办学质量，因为对学校的未知，流失了大量优秀的生源，五年后的今日，学校已经一学位难求。

让学生遇见最好的自己，就要让他们能看见未来美好的自己；让教师遇见最好的自己，就要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让家长遇见最好的自己，就要让他们愿意为教育去改变自己。只有让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明明白白、欢欢喜喜地去做事，就一定能够做成事！



揭秘鲁迅与鹿地亘 最后的交往

沈琦华

鹿地亘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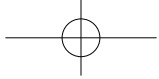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早在1932年，日本翻译家井上红梅就将鲁迅的《呐喊》《彷徨》译为日文，交由东京改造社出版。虽然这是最早定名为《鲁迅全集》的日文译本，但实际上只是一部“选集”的合译本而已。由于其中误译甚多，鲁迅在日记中对此译本颇有微词。

另一位鲁迅作品集的翻译者便是这位名叫鹿地亘的年轻人。鹿地亘，本名濑口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在日本国内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参加反战活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残酷迫害，不得不于1936年初乔装改名，秘密登上驶往中国的客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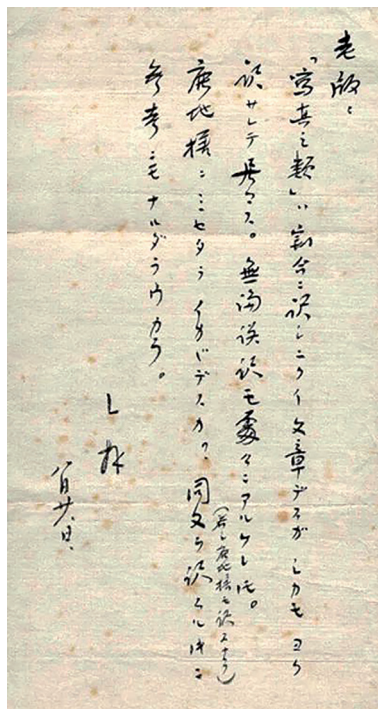
到上海后，经虹口四川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引荐，与鲁迅结识。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和介绍下，他开始为日本改造社翻译、介绍中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当时鹿地亘已开始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由于中文水平有限，在翻译中常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向鲁迅及其助手胡风请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后，东京改造社迅速决定，将原本即将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扩充为七卷本《大鲁迅全集》隆重推出。鹿地亘也成为了该书最重要的译者之一，专司杂文选集部分的翻译工作。

1936年10月22日鲁迅出殡，鹿地亘作为扶灵人之一为先生送行，当时有人称为鲁迅扶灵的十二位著名中青年作家为“鲁门十二金钗”，鹿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1939年摄于重庆）



鹿地亘家书“附件”，鲁迅（L）致内山完造（老版）亲笔日文书札

地亘是扶灵队伍中唯一的日籍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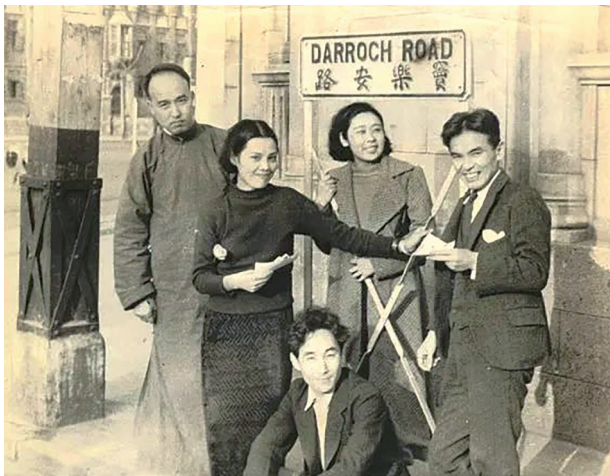
亲笔短札情谊感人

此次发现的鹿地亘遗札大多是他写给日本大分县父母的家书。在这批家书中，鹿地亘记述过鲁迅在病逝前，不顾重病在身，亲往鹿地亘夫妇虹口窠乐安路（DARROCH ROAD）“燕山别墅”35号的寓所。那天鲁迅逗留了一个小时，与他们叙谈甚欢。

在信中，鹿地亘向父母亲详细描述了鲁迅葬礼的情况，其中有些细节读之令人泪目。比如

鲁迅去世时，其独生子周海婴仅八岁，对于死生大事，还没有深切的体会，在葬礼会场吃着虾饼，蹦蹦跳跳的……鹿地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日本左翼文学青年对鲁迅深挚的感情和无尽的哀思。

这些信札，鹿地亘记人记事细腻传神，而其中一封家书的“附件”更是珍贵，竟然是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亲笔信，署款体例与《鲁迅手稿全集》第8册中所收“鲁迅致内山完造书札”三通完全一致，上款题“老版”，下款署“L”（笔名鲁迅首字母），同为鲁迅的日文书札，这在近几十年来所见公私鲁迅墨迹中，为



左起：胡风、池田幸子、鹿地亘、后藤和夫（右一），
摄于虹口鹿地亘夫妇寓所

家庭影集中有鲁迅、胡风

1936年10月8日，鲁迅抱病前往参观于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版画家亲切座谈。在鹿地亘家庭影集中有一帧记录鲁迅先生参加这次展览会的照片，显然与《鲁迅图片集》所收录者冲印自同一底片，座谈者左起：鲁迅、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

影集中还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年版画家合影的照片，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妇，后排：林夫、黄新波、陈烟桥、白危、力群。这两帧照片均为著名战地摄影家沙飞先生摄制，边侧都题有“一一·一〇·八日”，“一一”为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还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胡风、后藤和夫合影的照片，他们身后的路牌，赫然写着“DARROCH ROAD 寶樂安路”，这里正是鹿地夫妇在上海虹口的居所。鹿地亘家书的实寄封上也能看到这个通信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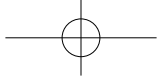
作为东京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胡风不仅为鹿地亘编译鲁迅杂文选目，还时常要给中文水平有限的鹿地亘解释、口译鲁迅作品原文，并编写简要的日文解题，按胡风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我完全是白尽义务，没有收一文编译费”。

在鲁迅先生离世前两天，其10月17日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往内山书

首次发现，实为特殊、罕见。虽然未具年份，但是并不难推知，此信写于鹿地亘着手翻译鲁迅杂文选集之初的1936年“八月廿六日”。

更为关键的是，此信中还提及鲁迅审读《论照相之类》（日译本题为《写真の類》）一文的译稿后，向友人内山完造建议，不妨也将译稿给鹿地亘看看，如果鹿地亘要另译，可参考此译本。

这封鲁迅手书的日文短札“附件”对于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成书经过，无疑是近年来发现的非常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墨迹实物。鲁迅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鹿地亘的赏识、信任、提携，含蓄地流露在此短札中，读来至今情谊感人。



左起：鲁迅、林夫、曹白、陈烟桥、白危

店。”日记中所称“谷非”就是胡风。那天胡风到鹿地亘家，鹿地亘向胡风提出了不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胡风怕自己解释不清，直接去请教鲁迅，鲁迅怕转达不清，又和胡风一起去鹿地亘家，直接解释给鹿地亘听。正是因为这次外出，鲁迅受了风寒，使病情恶化，两天后的10月19日，不幸逝世。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随着上海全面沦陷，鹿地亘夫妇曾一度被当作日本间谍看待，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来，在胡风的介绍下，鹿地亘多次参加《七月》杂志社组织的抗战文艺建设的座谈会，无疑是胡风在文化战线上，对鹿地亘夫妇反法西斯国际友人身份的认定，极大缓解了鹿地亘夫妇的精神压力。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还有两张日文剪报，都是鹿地亘归国后，日本媒体报道的有关胡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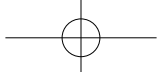
新闻事件，鹿地亘对旧日师友胡风的关切表露无遗。

藏札中的友人和医生

鹿地亘藏札中还有鲁迅挚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写给鹿地亘父亲、汉学家濑口真喜郎的两封信，信中简要介绍了对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大致情形。

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仅是鹿地亘来到中国、结识鲁迅的引荐人，也是东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书店位于上海市虹口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是鲁迅晚年在上海最重要活动场所之一，1932年起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避难和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坐落在虹口区的内山书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历史地标，见证了中、日两国左翼文学作家的交谊。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最后的主治医生，在鲁迅病重期间，差不多天天都要给鲁迅治疗。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在日语《上海日报》（1936年10月20日）与中文杂志《作家》发表了题为“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并附录“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须藤五百三写给鹿地亘父亲濑口真喜郎的信笺上印有须藤医院的通信地址“NO.108 MILLER ROAD.SHANGHAI 上海密勒路一〇八号”。



忆表姨夫周建人

顾崇本

我与周建人有一种曲折的亲戚关系，他是我的表姨夫。虽终生缘悭一面，但周老的嘉言懿行却助益我的一生。有许多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仍始终活跃在我的记忆里。

周老一直是低调的，平时踏踏实实，努力为党做好团结群众工作。他是20世纪40年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为了工作方便，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从没有公开过党员的身份，几十年来，作为他亲戚的我们，包括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1949年后，他担任“民进”中央主席，后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公开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政治身份。数十年来，他一直以学者身份，联系广大知识分子，引导和鼓励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周老这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讲原则、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尚品德和行为，也表现在他对子女和亲戚的教育上。

20世纪70年代前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小姐姐的大女儿叫成菊，论起来，她是周老的亲外甥孙女，也面临中学毕业下乡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上海学生毕业大部分分配到黑龙江、安徽等外地农场、农村。成菊体质很差，家里懂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成菊下乡是必然的，唯一所想的就是能够分配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农村，以便家里给予她一定的照顾。那时，周老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调到北京工作，邀我姐夫（即周老的外甥）成庆玉去杭州帮忙搬家北上，姐夫就想借这个机会请周老出面协调一下关系。当时，周老的女儿周瑾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恰好负责毕业生下乡分配工作。如果周老能够关照一下周瑾，把成菊分配到崇明岛，是最理想不过的；实在不行，运用周老在浙江的影响力，把成菊安排到浙江嘉兴农村也是上上大吉了。但是，姐夫到



了杭州后，姨夫早就猜出他的心事，就向他讲了一件事。他说：那次田中角荣到北京，你在电视上看到吧，我站在最后一位，（周老凡是碰照相之类的事不愿显摆，常以个子矮为由站在最边位置上）。回京路上在车上对总理讲：“总理啊，怎么我站得与他（指田中）这么近，到现在我还不知田中长什么样子？老眼昏花了，我该退休了。”总理马上回答他：“周老啊，你可不能退啊，国家需要你工作，如你感到住在杭州不舒服就到北京来吧！”我就没有坚持，这不就北上了吗？听了周老讲这件事，姐夫马上领会了周老话中的含义，就是让成庆玉服从政府分配，听从组织安排，不要搞特殊化。因此，想请周老帮忙照顾女儿下乡的事就没有再好意思说出口。

虽然我与周老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作为亲戚，他老人家还是知道我的名字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那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到上海招生。在当时人们的脑海里，新疆是那样的遥远、神秘，是落后和艰苦的代名词，我面临去与不去的艰难选择，心情十分矛盾。正好我姐夫成庆玉有事到杭州去见周老，我父母亲就托他向周老征询我的去向问题。周老了解了我的情况和思想后，让成庆玉给我父母和我带话，让我“听毛主席的话，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周老的态度给了我主心骨，坚定了我去新疆的信心。后来，我在新疆工作近四十年，人生中遭遇的困难真是一言难尽。首先，在物资匮乏年代吃不饱，饥饿感折

磨了我多年，一生都在它的阴影笼罩下。其次，是工作安排不合心愿，学校毕业后原本应是做技术员工作，但组织上却分配我去学校当了教师；“文革”时因父亲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被人诬称为“反动会道门”，代父亲被批斗；更给我带来伤痛的，是十岁的儿子刚从上海接回新疆不多久，竟然不幸溺亡，那时的情绪就不能用言语表达了。虽然其间我也有去广州、南京和到喀什师大任教等机会，但周老教导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的亲切话语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坚定了我在新疆农场干下去的决心和意志。2016年我荣获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荣誉证书，这应该是周老一片心血浇灌出的美丽花朵。

我到新疆工作二十多年后，周老还一直记得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来信，信中十分关心地问我：“这些年你加入组织了没有？”当他得知我还未加入组织，便建议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我对如何加入民进的程序还不甚了解，不懂得如何才能加入。周老又来信告诉我首先要写加入民进申请书，写好后把申请书寄给他，由他代我转给民进中央组织部。在周老的关心下，1984年底我终于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三年后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惜没有来得及把这件我人生中的大事告知老人家，他就不幸辞世了。如果他健在时看到我的进步，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这真是我最大的遗憾！



宅门断想

陈 钰

人生历门无数，或徐或疾，或欣或虑，或亢或惫流转于形形色色之门，唯宅门最亲。宅门虽不如宫殿门华贵，不似庙堂门神圣，通常也不及公共建筑门宽敞，然根植乡愁情愫，刻录生活痕迹，故极富归宿感。

宅门，对建筑师而言乃屋舍出入口、视觉焦点，对住户而言是私家屏障、空间隔断，对外界而言系权益表征、文化符号。不同时代、地域、阶层的人们对宅门的观感殊异，有的仅在意最基本实用功能，有的则相当讲究艺术格调和个性品位，宅门因此而仪态万方。中国人尤看重宅门，以至引申出门第、门风等概念，代指世家德行风尚。

当下都市高楼万丈广厦林立，百姓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唯住宅门面似千篇一律大同小异，“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李白《赠崔秋浦三首》）雅韵不复，“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尘封梦忆，“甲第面长街，朱门赫嵯峨”（张华《轻薄篇》）旧影依稀，“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传唱经久。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有底蕴、存温度、可阅读的城市，尤以近代“万国建筑博览会”名闻遐迩，不仅矗立着许多显赫的地标性公共建筑，更有海量“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李白《宴陶家亭子》）民居坐落于城厢内外，样式多元，中式传统、中西合璧、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装饰艺术风格、现代主义等不胜枚举。

人们常把石库门看作昔日上海经典住宅之代表，斯言不谬，笔者赞同。然窃以为不能以偏概全，尽管石库门量夥势盛，却并非专享上海近代民宅门



户独尊。就都市肌理和艺术价值而言，充其量属大众化及中产阶层一族，其他门类亮点颇多勿容怠慢。再者，不唯石库门、老洋房之门值得青睐，散布城乡村落各处民居，哪怕寒门冷宅，只要有灵性，亦当关照存录。近年但凡出行，必特别留意民宅，虽仅限管窥蠡测，然亦每每步行逾万。城市更新难免拆除重建或保留改造一批已不适合现代人居住的老弄堂，但同时又应保护城市文脉的肌理，是故，抓紧搜集尚未被征收、封闭、推倒且有风味者的相关资料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看似吾索宅门，实则宅门索吾。

审视上海，解读上海，表现上海是多元的，替一扇扇阅尽悲欢离合世道沧桑的宅门诚绘容貌如初之小像，也算是对上海的某种尊敬。这些门背后是否有故事抑或曾住过名人，任其自然，但凡门，即便是蓬门、柴扉，只要本身兼具美感和艺术特色就值得一视同仁。可敬可颂的主角是佳门设计者及埋名隐姓的工匠，何况历经七八十年乃至百余年嬗变，沪上老宅门哪家没故事？拙画纯为应答内心召唤，不求闻达，倘遇

二三知己不嫌足矣。至于网红打卡潮人若想过把瘾，大可在茶余饭后沉浸手机或电脑，看看那些爆料欲旺炽人士的博客，读读海量炫富崇贵的云图文，既惬意又轻松哩。

手绘宅门，将心性托付于一扇扇阅尽春秋的老宅门，不蔓不枝，不妖不艳，守正拓精，含蓄从容，任其如陈酿慢慢经历时光催化发酵而醇和。诚如梁启超1923年结束在东南大学半载授课发表告别演说时箴言：“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的饥荒”。学无止境，师无古今，无论行脚还是读书作画，皆可处处领教。

有道是“涉门成趣”，宅门启蒙育人乎？余笃信。道他人所未道，绘他人所未绘，趣也。手绘“近代上海宅门撷萃”酝酿多年，数载前已属意穿梭寻访有风情老街坊，实地考察，旧照索隐，蒐集素材，铢积锱累，辛丑年仲春开笔，至癸卯春绘就二百余帧。

关于宅门话题，思忖良久腹稿衮衮，亲历访门、品门、画门，遂命笔述之。



赵丽宏：诗心俱与人品长

汤朔梅

赵丽宏是我的学长。我认识他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还是一以贯之地儒雅、真诚、厚道、睿智。“有时你很淡，淡如透明的流水，从污浊中缓慢流过！世界上，还有水晶般洁净的心地！哦，哪怕你凝缩成，一次紧紧的握手，一声轻轻的保重，一首短短的小诗……”这首《友谊》五十多年过去了，还常常有人在各种场合朗诵。就像同样写于那个年代的《江芦的咏叹》，由焦晃等艺术家，多次朗诵表演。正如欧阳江河说的：“赵丽宏先生可以一直不停地写作，在于他语言的平实，不玩花活。他忠实于自己，反而可以把写作写到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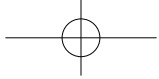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一、厚道、真诚的学长

我们能够成为校友，得感谢邓公当年的力挽狂澜。也可以说是命运浓缩了

十年的光阴，使许多差十多岁的两代人，在同一经纬上交集。我发表第一篇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都离不开赵丽宏，我的老赵。我一九七八年秋天跨入华师大校园，成为中文系的学生，才知道七七级中文系有赵丽宏、孙颙、王小鹰。我在《朝霞》（抑或是《上海文艺》）还有在两报的副刊上，读过他们的诗文。感觉算是高中毕业，其实正儿八经才读了三年半小学的我，像丑小鸭一样，能望见天鹅的相背，期待蓬麻自直，实在是有幸。



赵丽宏大学时代在“小黑屋”读书



那时的大学校园，文艺气息浓厚。每个系、年级都有黑板报。不要说刊登的诗文，即便是粉笔字和插图，水准都相当高。还有文学社团，七七级的“草木社”，七八级的“春泥社”。在这氛围的熏陶下，忽然我也涂起了诗来，日就月将也写了一些。某一天突发呆想，何不给赵丽宏看看？当时，赵丽宏与另外几位七七级学生，已是学校的名人。去上课路上，同学们指着说：那个就是赵丽宏。他与我同住第一宿舍。但我胆子小，不敢贸然去找。其实，主要是怕自己涂的所谓的诗，入不得法眼，以至于遭人笑话。于是就观察他在哪个教室自修，如是再三，不敢稍动。终于有一天，留意他去文史楼213教室，于是跟进，坐在他后面隔一个位子，装着看书。他看书间隙如厕，进来时见我看着他。就朝我笑笑。等他坐定，我上前介绍自己，并将几张纸塞给他。他看，我坐对面，于心惴惴。过一会儿，看着我说，写得蛮好，还应注意哪些方面问题。我知道，说蛮好是鼓励。自此信心倍增。以后，在校园内碰到，即便他与同学交谈着，目光相遇，他总是点头笑笑。后来，这样的请教有三五回。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喜欢诗歌的，在课余时间，常写诗、谈诗。于是认识了宋琳、张黎明、徐芳等。我们以诗歌的名义在校园内聚会：在丽娃河畔朗诵，在夏雨岛上跳交谊舞，出后门去枣阳路上喝小酒。我班的刘新华建议，你们何不搞个诗社呢？于是就筹备夏雨诗社，我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一天课间，宋琳找我说，我们请赵丽宏做顾

问吧！我说那好。那时，赵丽宏刚毕业，在《萌芽》当编辑。宋琳说不认识赵丽宏。其实这不认识是指没接触过。他说你认识的。我说，我也只是请教过几回，他或许不熟悉我的名字。他说那总归算认识的。他说你见面怎么称呼的？我说没称呼。因为叫他赵丽宏，显然不妥，他是学长，而且是有名诗人；称呼他老师，其实他还是学生，如此显得假，他也未必舒服。宋琳说就叫老赵吧！从此。“老赵”叫到现在。他给了夏雨诗社很多支持，给《夏雨岛》诗刊作指导，参加“希望诗会”等活动并担任评委。在他的鼓励修改下，我和宋琳等同学的诗在《萌芽》上发表。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记得毕业前，我从华师大去中山公园，他来学校，正巧在凯旋路铁路桥上遇见。他问我毕业分配在哪里？我告诉他这一届有个政策，郊区来的一律回郊区。沉默片刻后他说：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我想他这么说，一定与他当年崇明插队落户，去宜兴做木匠的经历有关。他的创作，总能找到当年的影子。写作需要生活，而这就是生活！我回到了当年考出来的新寺中学。到语文组打开橱柜一看，四年前吃饭的146号搪瓷碗还在，筷子也不缺。我心头一震！那可是搬了几次地方的？当然这是后话。在以后的日子里，始终记着老赵的那句话。从此，差不多二十五六年，我们没有联系。只是看到关于他的消息，和他出的一本本书。那年，奉贤图书馆新馆开张，得知他是剪彩嘉宾，我向朋友要了联系方式。深夜，接通电



话，依然是那个温婉而熟悉的声音。报了名字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些年怎么没一点消息？我心里一热。问起写作，我说已很少写诗，只在生活的淡散中写了许多散文。

那天仪式开始前，我看到他还是一头自然蜷曲的头发，略有花白。依旧魁梧挺拔，一脸的谦和。仪式后我们见面。他说那天电话后在想，这么些年下来，你一直在江湖上混，不知进化成怎样：是一张阿谀奉承的脸？一张市侩的脸？一张所谓看淡一切的脸？聊了几句后，老赵说：我看得出，你一点没变，还如当年。我说起当年凯旋路桥上的情景，还有那句话，他唔唔着似乎不记得说了什么。那不重要，我一直记着。

之后，我去他作协办公室，把累年的散文打印后给他。之前我发过几篇给他。他说，我看了你的散文，证明我那天的判断是正确的：你没变，还是那么沉静，没被尘嚣吞没。2009年过了正月半，我联系他问写序的事，他说在北京开政协会议。他说你别急，那稿子我带着，在看。他说你写农村的人和事，接地气而令人感动。要为我认真写一篇序。我心头一热。他这么忙还带着我的习作，真是过意不去：他，永远是那个老赵！厚道，真诚。

二、知性、淡泊的诗人

赵丽宏年轻时作为诗人登上文坛。五十多年诗作常盛不衰，佳作连连，可谓创作生命力旺盛。



2007 在泰戈尔故居前

当年在校园内，他的诗作一经发表，皆为大学生传诵。在考上大学前，他在崇明岛插队落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十年，成了“老三届”的共同记忆。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劳动，困顿的生活，考验历练了他；地大物博，贫穷落后的现实，震撼了他的心灵，引起了沉重的思考。崇明岛上的岁月，成了赵丽宏写诗的原动力。他早期的诗歌中都能找到这段经历的影子。“我发现自己快成了哑巴，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心灵的门关得那么紧，乡风只能在门外喧哗”（《哑巴》1970年）很明显，那是特殊年代，诗人不敢说真话，又不屑说假话的苦闷写照。于是只能关闭心灵，以阻挡门外的尘嚣。而诗人并不因之而消沉，“我要燃起熊熊的火，在那迷惘而昏暗的夜晚。没有木柴，可以拆下船板，哪怕，让整个小船化作一团烈焰。倘若当时还有清醒的眼睛，就一定能发现我心中的呼唤”（《火光》1970年冬）。从中，我们能感知诗人那颗坚强不屈的心。生命的小船在人生的涌浪中前



2018年赵丽宏和莫言一起访问阿尔及利亚

行，遇到困难险阻，不惜拆掉船板，也要点燃希望之火炬。《友谊》写于1971年，最早知道这首诗，是在赵丽宏的一次创作谈讲座上。那时，他作为高年级的学长作讲座，那天他诵读、讲解了好几首诗，而这首《友谊》深深打动了。 “有时你真像 | 寒风中的芦苇。叶枯根焦 | 茕茕孑立 | 几乎失却生命的颜色。然而在泥土下 | 有冻不死的芦苇 | 有割不断的根须。真的 | 即便在最寒冷的夜里 | 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温暖深沉的注视。” 那是他在困顿中感悟出的友谊。

他的诗，即便后来融入对现实、未来、自然、生命的思考、探索。例如他的诗集《疼痛》与《天空》，一直保持着他的风格——知性、淡泊、隽永。知性，源自对生活的洞察，对中外文化、传统文化的积累与融化；淡泊，是体现在诗歌的风格上的一种冲淡、温婉的美学意义；而隽永，则是来自以上两种特点，而产生的回味无穷的美感享受。赵丽宏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特殊的爱好与研究。他的两

册《玉屑集》，正是这一点最好的注脚。《玉屑集》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连续登载了两年。他对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拿音乐来说，他对西方音乐情有独钟。记得大学时，他曾做过讲座，谈了好些音乐大家对他的影响。其中重点讲了印象主义大师德彪西的作品，以及对他的代表作《牧神午后》《大海》的理解。诗与音乐应该是最贴近心灵的艺术。这一切，都为赵丽宏的诗作提供了养分，插上了翅膀。

正如陈世旭在谈赵丽宏诗时说的：“他的写作继承了古典文学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传统，同时又兼容了时代的敏感话题，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读赵丽宏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典雅与深邃。在纷繁驳杂的当代诗坛，赵丽宏的诗是一股不折不挠的清流。”

赵丽宏写诗五十多年，作品蔚为大观，创作生命长盛不衰。最新的诗集《疼痛》与《变形》保持了他的风格，但在对人生、命运的主题上，拓展了



广度，开掘了深度。《疼痛》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更受国外读者的喜爱，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这在现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世界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曾如此评价《疼痛》“疼痛超越了身体的界限，而涵盖了思想和灵魂。它是字面的，又是意义的。”赵丽宏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在国际上多次获大奖，正是基于他坚持自己的风格，体现真、善、美，从而获得广泛的喜爱。

三、睿智、童心的创作者

赵丽宏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我觉得他的诗与散文同源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其创作起源，还在于其取得的创作成就。说是同源，我私以为都源于他崇明岛上插队的岁月。借此可以说，崇明岛是成就他诗人与作家的摇篮。其实，从生命意义上来说，那也是他的根。因为那里还有他的老家旧宅，还有自族的亲人。他最早的散文，和诗歌一样，也是从崇明岛的土壤里汲取了营养。诗与散文以其不同的体裁，实现了互补，抒写着发生在那里的事。如果说诗像音乐一样，抒写了关于苦难、迷惘、奋斗、命运等主题；那么散文则像雕塑，具体地矗立起，个体与群体跟自然搏斗、命运搏斗的形象。《岛人笔记》中的许多篇什，正是这样的写照。《队长》中的那个倔强、耿直、公正又善良的矮脚队长；《元狗》中的那个憨厚木讷、力大无穷、死命扛住千斤重的粪车、善良老实的元狗阿哥；那个美丽却

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鹁鸪；那个在小木屋里守着灯塔一辈子的孤独老人。这些故事，从赵丽宏温婉优美的笔底流淌出来，充满了人文关怀。

这是他创作的底色与情怀。他写了许多散文，涉及的题材广泛。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大及宇宙星空，小至虫兽花鸟；生命的主题，灵魂的拷问。这么宽泛的题材，宏博的创作，都体现着作者的善良、睿智。而这一切，都可以从他故乡崇明岛的土壤里找到注脚。从数量上说，据不完全统计，他出过十八本诗集，而散文集却有三十多本，可谓著作等身。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如此丰赡的创作成就，一般的作家难以企及。近十年来，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儿童文学的创作。他的儿童长篇小说有《童年河》《渔童》《黑木头》《树孩》和《小黑虎》《白雪公主逃亡记》《树上的卡拉斯》等，都广受欢迎，印数在一百余万，几十万不等。作品从孩子的视角，反映了不同的主题。我以为，他的小说与诗歌散文虽体裁不同，表达的形式不同，却有着内在的相通。那就是搏动着一颗追求善良、美好的赤子之心。从中也能体会出赵丽宏对美好的向往，对作品中人物的种种不如意的悲悯。从而给人以对美好的追求。

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坎坷，而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好与向往。童心永驻，诗人不老！诗心俱与人品长……



记民进优秀会员 著名男高音独唱艺术家许幼黎

夏世铎

民进优秀会员、著名男高音独唱艺术家许幼黎同志，曾在上海民族艺术团担任独唱演员。在退休前，曾为民进市委做过促进祖国统一、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许多工作，受到我会表扬。他一生善良大度，热心公益，和蔼近人，深受群众敬佩爱戴。

1955年，我在民进市委负责宣传工作。为发展扩大统战工作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常去联系他，往来密切，邀请他参加对台宣传工作。他曾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对台宣传工作，与台湾同胞对话，引吭高歌，发挥他高超的独唱艺术天赋，获得广大台胞的热烈欢迎，齐声赞扬，取得对台宣传的良好效果。

令人十分赞美的是许幼黎的热心公益。他时常应邀参加民进市委、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以及各单位的文艺晚会、纪念庆祝活动。他总是满怀激情积极应邀参加，有多次与著名笛子大王陆春

龄，戏剧家梁谷音、王珮瑜等同台义务演出，尤其他扮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唱“打虎上山”一段，高亢的嗓音，令人念念不忘。他还多次出国举行独唱艺术演艺会，蜚声海外，为国取得光彩。

尤令我难以忘怀的是，许幼黎每年两次偕同优秀民进会员、女高音表演艺术家黄葆慧来我家探望我，与我欢叙良好友情。我的海外、台港澳亲友，每次来沪拜望我，在我招待宴请会上，为了扩大统战影响，我总是邀请他们俩参加作陪，他们也总是热情参加。他们与我在一起都愿与我合影留念，为了留住记忆，我特意刊登在我的回忆录中。

许幼黎有个快乐的家庭，他夫人孩子都精于钢琴演奏。孩子曾出国留学，成为钢琴演奏家，多年前曾在上海音乐厅举行过钢琴独奏会，受到听众的好评。遗憾的是三年疫情使我与他失去了联系，直至放开后，我们又联系上了，重叙我们的深厚情谊，安度幸福的晚年。



民进上海市委 2023年1月至2月大事记

1月

1月5日

中共市委举行专题协商座谈会，就2023年市委重点工作安排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代表民进市委就2023年全市工作，从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和“双碳”战略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月6日

民进市委在线召开2023年市“两会”新闻媒体通气会。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出席会议并讲话。

1月10日

政协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开幕。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副主委张伟滨、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原副主委陈振楼、余岚出席会议。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列席会议。

1月17日

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的重要讲话，交流学习体会。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出席并发言，专职副主委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出席会议。

1月18日

民进市委机关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1609会议室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上海两会精神。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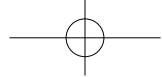
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出席并分别传达了两会精神。秘书长蒋碧艳主持会议。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

1月20日

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走访看望了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陪同看望。之后，黄震看望了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邓伟志，何少华陪同看望。随后，黄震走访看望了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原副主委赵丽宏，何少华陪同看望。

1月29日

民进市委十七届十次主委会会议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1609室召开。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讲话。副主委戴立益、郭坤宇、潘向黎、何少华、杨蓉、倪闽



景，秘书长蒋碧艳出席会议。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及各部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1月29日

民进市委2022年度机关年终工作总结会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1609会议室召开。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讲话。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出席会议并进行工作点评，秘书长蒋碧艳主持会议。

1月31日

市政协主席胡文容，中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等市政协、市委统战部领导一行走访民进市委机关，详细了解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情况，听取对市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向机关干部致以新春祝福。市政协副主席肖贵玉、金兴明、虞丽娟、吴信宝，秘书长黄国平，市委统战部领导黄红、王霄汉、房剑森、王珏、蔡忠、蔡桂其、李霞等参加活动。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等陪同。

2月

2月1日

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走访上海歌剧院，与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蕾，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庆新等进行座谈交流。

2月2日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召开新年学习会，总结2022年工作，交流2023年任务。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代表民进市委发言，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参加会议。

2月3日

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俞烈，提案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尹桂云一行走访民进市委，就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年度重点提案遴选进行协商。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

2月7日

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围绕主界别会员发展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走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与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杨春花，党群工作部主任周勇剑等进行座谈交流。

2月8日

民进市委第七届直属新会员第五支部在上海经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第四次组织生活——“走进民进会员企业”。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出席活动并讲话。

2月10日

民进上海市第十七届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六楼会议中心举行。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讲话。民进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杨金龙出席并致辞。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

2月10日

上海民进企业家联谊会换届大会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六楼会议中心举行。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讲话。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



2月10日

民进上海市第十七届委员会专委会换届大会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六楼会议中心召开。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会议并讲话。民进市委副主委张伟滨、郭坤宇、潘向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

2月11日

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一行赴民进成立旧址纪念馆参观。民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邱江霞、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陪同参观。

2月11日

由民进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上海青年工作委员会自导自演的话剧《共和国不会忘记》成功上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民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邱江霞，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观看演出并与全体演员合影。

2月14日

民进市委召开2022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围绕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政治交接主题教育，紧密联系上海民进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主持会议并讲话。民进市委副主委戴立益、郭坤宇、潘向黎、何少华、杨蓉、倪闽景，秘书长蒋碧艳参加会议并发言，副主委张伟滨提交书面发言。民进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胡卫应邀列席会议。

2月15日

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一行走访考察民进会员企业上海长盛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大汉三通集团。

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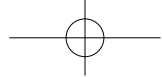
民进上海市委第七届直属新会员第二支部举行支部会议，并组织会员参观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化工联合实验室。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出席活动并讲话。

2月17日

第五届上海民进企业家联谊会第一次会长会议在花园饭店举行。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出席会议并讲话。

2月19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研讨会暨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世承讲堂举行。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作视频致辞。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殷一璀出席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王平，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在勇，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市教卫工作党委原书记、上海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陈克宏，中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忠出席会议。民进市委副主委倪闽景出席并作研讨发言。民进市委原专职副主委、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卫出席并发言。民进市委副主委戴立益、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会议。同日，召开了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建设专家咨询会。黄震、何志敏、袁雯出席并致辞、讲话。胡卫主持会议。



2月21日

民进2023年“作风建设”主题年工作动员会（视频）在京召开。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出席上海分会场会议。

2月22日

民进省级组织专职副主委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会议并讲话。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参加并作工作交流发言。

2月22日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市知联会、市职教社负责人学习联席会（简称学联会）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召开。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参加会议。

2月22日

民进嘉兴市委专职副主委汪林青、中共海宁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炯一行来民进市委就筹建陈巳生史料陈列馆以及相关会史研究工作开展调研。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出席调研座谈会。

2月23日

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一行赴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浦江第一湾”规划建设工作，了解科创企业情况。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俞烈，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杨蓉，秘书长蒋碧艳陪同调研。

2月23日

民进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华甸园会议厅召开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何少华，秘书长蒋碧艳出席会议并讲话。

2月24日

第十六届上海民进教育论坛在虹桥郁锦香宾馆举办。论坛主题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并讲话。民进市委主委黄震，中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忠，市教委副主任王浩出席并致辞。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教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姜其和，民进市委副主委郭坤宇、何少华，秘书长蒋碧艳，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出席活动。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主持论坛领导致辞和主旨发言环节。民进市委副

主委倪闽景作主旨发言。民进市委原专职副主委胡卫特邀主持圆桌论坛环节。

2月25日

以民进会员为主要发起人的上海梦想成真公益基金会举办成立七周年公益盛典。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沙海林，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秘书长蒋碧艳出席活动。

2月27日

民进市委十七届十一次主委会议在上海民主党派大厦1609会议室召开。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出席并讲话。副主委何少华、杨蓉、倪闽景，秘书长蒋碧艳出席会议，二级巡视员季国进、各部室负责人列席会议。